

【论 文】

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构建¹

马 戎

摘要：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帝制后，中国社会即面临政治体制的大动荡和中央政府与各边疆地区关系的大调整。各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并极力分化中国，中国社会亟需引导内部区域间、群体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和认同意识领域进行整合。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可以说危机四伏。许倬云先生说：“1911年后，中国面临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能够维持国家不亡已是奇迹。”中华民国的37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近期学术界研究的成果，试图对贯穿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如何得以巩固并得以再构建历程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

关键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国族构建；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年代。有三条主线贯穿了中华民国37年的历史：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其中最严峻的年代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各种分裂势力的斗争，如反对“伪满洲国”、“蒙古自治政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斗争；第三条主线是积极探索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崛起、日本侵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一个传统“多元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引导全体国民完成在认同意识方面的思想转变，把对中华国家的认同作为每个公民最核心的政治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国外思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各国政府在对华外交、经济文化渗透以及军事势力的介入，具有双重性的影响，一方面各国政客和学者公开向中国各族精英人士介绍和灌输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和现代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境外政治势力又或明或暗地积极借助这些现代理念鼓励中国境内各群体争取“独立”，试图瓦解中国并将其转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辛亥革命后，这三条主线彼此重叠、交织在一起。新生的中华民国既要抵御外敌入侵和防止内部分裂，又要改革国家政治体制以推动民主宪政²，从而呈现出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与冲突。在国家体制转型的这条主线上，我们既看到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时期的议会选举与议政实践³，也看到江西苏区试行的苏维埃制度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代表制度⁴，但是这些政权建设的进程往往被接连不断的国内外战争所中断。

一、清帝退位后国家面临分裂风险

¹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4期，第 页。

² 在国力衰弱、内部割据、外敌环伺、危机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未必是一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章太炎在1912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曾建议多给袁世凯一些权力，“此存亡危机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建议由袁世凯“暂以便宜行事”，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当时边疆地区的危机（马勇，2008，“章太炎筹边考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69页。）

³ 安德鲁·内森，1983，“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315页。王建朗，2008，“战争·集权·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92-218页。

⁴ 李云峰，1986，“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及其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其影响迅速遍及全国，数月之内“光复十七省”。1911年底，南部各省代表齐聚南京，共同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在全国报刊显示民意普遍支持武昌起义及大多数地方督抚宣布赞成共和体制后，清朝正式颁布了《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¹

这个《退位诏书》非同小可。第一，向世界建交各国公开昭告清朝皇室正式退位，并将国家体制由帝制变为“共和立宪国体”；第二，委托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对内通过协商实现“南北统一”，对外行使中央政府全部外交权利；第三，明确宣布“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是当时中国国体转型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终结了自秦始皇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政体，奠定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继承大清帝国全部领土的合法性，宣布新生的中华民国继承大清帝国签署所有国际条约责任和义务，并根据国际法继承大清帝国权责和国际地位的法制基础。换言之，清廷对全世界各国宣告中国正式改变国体，把大清帝国所有领土、国民、国家财产和其承担所有国际条约及历次战争赔款的责任统统转交给新生的民国政府²。许倬云先生指出：“经过满清皇帝的逊位诏书，确认将来全部的领土转移为中华民国，这才是中国疆域延续满清帝国领土的法律根据”³。

由于这一《退位诏书》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公认，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的领土、国民、条约权利及义务符合国际法。1949年内战结束后，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由清朝转给民国的全部领土、领海也完全符合国际法，台湾只是民国政府残余势力凭仗海峡而继续盘踞的一个省份。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废除了之前历届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许多内容，但是对国际社会已承认的有关领土边界的条约，新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尊重，以避免边界军事冲突。⁴

清朝皇帝退位并终结帝制，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因为许多边疆地区首领对中央政府的尊崇和服从建立在清朝皇帝的传统权威基础之上，所以清帝退位后，这个风雨飘摇、内外矛盾重重的“多元型帝国”随即面临崩溃瓦解的巨大风险。此时，对中国领土觊觎已久的列强自然意识到这是瓦解中国、瓜分赃物的最佳时机。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与沙俄总理曾密议如何瓜分满洲和内外蒙古，谈话纪要中提到“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议，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

¹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1121/16/32829_1005254537.shtml (2022-3-15)

² 北洋政府宣布继续履行清朝此前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庚子赔款为例，至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称停止支付庚子赔款为止，1902-1938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https://www.sohu.com/a/419801880_557768 (2023-8-28) 1942年之后，国民政府宣布废除除割地赔款外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仅仅留下租借问题和长江航权以及领海的问题。

³ 许倬云，2015，《说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83-185页。

⁴ 在2017年“洞朗事件”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仍以1890年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为依据，表明印度军队越境的事实并要求其撤回。

年协议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¹。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没有放弃分化瓦解中国的计划，反而把清朝皇帝退位视为鼓动边疆各少数民族进行分裂独立活动、瓜分中国领土的最佳时机。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5条直接涉及内蒙古主权²。

1911年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领事直接参与下，召开由18位王公喇嘛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外蒙古独立”。沙俄政府随即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当时，在内蒙古6盟49旗中，有35旗王公响应或支持库伦“独立”。1912年1月沙俄和外蒙古军队占领呼伦贝尔，成立隶属外蒙古的“自治政府”³。同年，沙俄军队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约15万平方公里），驱除清朝驻守官吏，随后移民12,000人。1912年十三世达赖在英国支持下宣布“驱汉”⁴。1913年7月，沙俄协同外蒙古军队占领清朝直接管辖的科布多地区，驱逐科布多大臣并觊觎其管辖的阿尔泰地区，因杨增新及时增援保住阿尔泰并将其转由新疆省管辖⁵。在1913年10月“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提出内容基本相同的“西藏”边界草案，并私下秘密划定“麦克马洪线”作为西藏地区和英属印度的边界，为此后中印边界争议留下后患⁶。

各边疆地区空前严峻的形势和国家分裂的紧迫危机直接摆在辛亥革命领袖、北洋军阀首领、全国各族民众与各界精英人士面前：是主张“分”，还是主张“合”？如果主张“分”，是否以十八省为新“中国”的疆域范围？那么，居住在十八省的几百万满、回、苗、夷、番等“非汉人”的各族民众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否依照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⁷这将在全国各地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血腥局面？而那些居住在十八省范围之外的几百万汉人，又将会是什么命运？是在当地的族际冲突中被杀，还是全体迁回十八省境内？1912年内蒙古境内有116万汉族人口和87万蒙古族人口⁸，如果内蒙古各地出现蒙汉冲突，将会是怎样一个血腥的局面？我们无法查到清末新疆各族群的人口数字，但是据记载，仅1902-1935年间迁入新疆的汉人即不下20万⁹。那么，一旦在新疆出现“排汉”运动，加之宗教因素，是否会出现一次惨烈的种族清洗？

孙中山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曾经持有十分激烈的反满立场。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长驱入关，来我中国，据我政府，……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¹⁰，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入盟誓词》中均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并在1911年底出席在上海和南京的会议。当时与会各省代表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坚持“驱除鞑虏”和“十八行省建中华”的建国方案，必将导致族群仇杀和全国大乱，“国将不国”，并一致主张应当在清朝现有国土范围内建立一个共

¹ 王春霞，2005，《“排满”与民族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第263页。

² 余元鑫，1958，《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7页。

³ 今天的呼伦贝尔盟在清朝时期，既不属于“内蒙古”也不属于“外蒙古”这两大特别行政区，而是属于黑龙江将军辖区。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后进占呼伦贝尔地区，将其纳入“伪满洲国”管辖范围，设立“兴安北省”和“兴安东省”。

⁴ “国内外以前都提1913年1月达赖喇嘛宣布‘独立’事，但据有学者最新研究，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此事。达赖喇嘛发布的例行的《新年公告》，其实并未正式提到‘独立’问题。声称西藏和蒙古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不过是俄国间谍德朗智擅自代表西藏所为，它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承认，连热心此事的俄国和英国也不予承认。甚至十三世达赖本人也予否认”。（喜饶尼玛，2000，《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

⁵ 李国栋，2009，《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第19-27页。

⁶ 张植荣，1994，《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第61-67页。

⁷ 邹容，1903，《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

⁸ 吴明，1982，“内蒙古人口的历史概况”（未正式刊发论文），16-17页。

⁹ 周崇经主编，1990，《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57页。

¹⁰ 孙中山，1894，《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296-297页。

和制国家，把汉、满、蒙、回、藏等各族都以平等国民对待，从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在这种大形势下，孙中山和同盟会领袖们最终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日本人发明并长期鼓吹的“十八行省建中华”的狭隘汉人种族主义观念最终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辛亥革命时曾一度打出的十八星旗也改为五色旗¹，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建国新理念。

民国初期《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同时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²。这个《临时约法》把清末“排满”和“反排满”的论争画上句号。“正是在这种态势下，孙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国领袖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事结构（culturalist narrative of the nation）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事结构（racialist narrative）。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开始由‘五族’（five races 满、蒙、藏、回、汉）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大清帝国的边界线，正如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试图根据大英帝国的构思（image）来重建一样”³。

孙中山在1912年初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正式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⁴。他在1924年修订的《三民主义》第一讲中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⁵。他强调：“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⁶。明确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这可以被看作是孙中山“民族观”的重大转变。孙中山以美国为例来说明中国的五族完全可以融为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美国人的种族，比哪一国都要复杂，各洲各国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国之后，就溶化起来，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自成一种民族，……叫做美利坚民族”⁷。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讨论“五族共和”时，曾提到“同化”。1921年12月，他对滇赣粤军发表演说：“所谓五族共和者。真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⁸。有些人批评他使用“同化”一词，但是实际上他所指向的乃是各族之间的“融合”：“吾国今日既言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⁹。不同族群之间如果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太大，隔膜感总是存在的。欧美社会主张的“文化多元主义”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社会中，群体差异就意味着群际区隔和界限，在一定的氛围和条件下，族群界限就有可能演化为族群冲突。赞成族群融合并不等同于强迫同化。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族群文化差异的潜在演变方向有可能会添增政治色彩，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身份。“‘民族平等’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公民或国民平等’恐理应更为优先”¹⁰。

¹ 五色旗首先在1911年12月4日由部分省份代表在上海开会时议定，“取五族共和的意义 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国内革命军打出的旗帜曾十分混乱，“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王春霞，2005，《“排满”与民族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第245-246页）。在南京会议后逐步统一为五色旗。

² 夏新华、胡旭晟等编，2004，《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³ Prasenjit Duara,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 76.

⁴ 孙中山，1912，《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2页。

⁵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185页。

⁶ 孙中山，1920，《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394页。

⁷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193-194页。

⁸ 孙中山，1921，《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24页。

⁹ 引自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39页。

¹⁰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0页。

坚持五族共和，坚决与帝国主义鼓动和支持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努力维护国家统一，这就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中华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内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主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亲自致电各蒙古王公，对他们晓以大义，不要受外人挑拨¹。袁世凯改北京皇城正南门（原称“大清门”）为“中华门”，把中南海正门命名为“新华门”，皆含“中华民族”的寓意。

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命令》宣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画，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²。表明民国政府将在国内各族平等的政治基础上开启管理体制的统一化调整。

1912年8月北洋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宣称中国对满、蒙、藏的主权。声明的第5条原则是：“现蒙、藏反抗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暗中主使一切”。这也明确指出这些分裂活动均由列强“主使”。1913年，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³，明确表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同年设立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行政区，开始加强在行政区划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视蒙、疆、回、藏与内地各省平等”，制定选举办法和分配名额，吸收各少数民族地区代表参与参议院、众议院和国家管理⁴。1927年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东北地区的管辖权，继续推行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建构”。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宣称“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⁵。“中华民族”开始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核心政治概念。此后出版的常乃惠所著《中华民族小史》（1928）、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1928）和张其昀所著《中国民族志》（1938），相关著述都以全体中国国民作为“中华民族”成员。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曾被译为蒙文和藏文，“但直到‘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它可以说真正在社会上特别是民间社会勃然而盛、广泛流行”⁶。

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究竟哪个层面的群体应该被正式称为“民族”？如果在祖先血缘、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的国内群体（民国初年“五族共和”时期流行的“汉满蒙回藏”等）都被正式确认为“民族”，那么，这些“民族”与代表整体中国的“中华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将国内的这些“民族”置于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的概念话语中？在现代中国这个政治实体中，这些被承认为“民族”的群体应当拥有哪些政治与文化权利？对于上述问题存在的不同观点和激烈争议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民族自决权”

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转给日本，引发北京“五四运动”和全国各地的抗议浪潮。当时的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地方自治”，努力安抚内蒙古、西藏等民族

¹ 李国栋，2009，《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第89页。

²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1994，《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346页。

³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0页。

⁴ 李国栋，2009，《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第111，106-109页。

⁵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⁶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3-174，187页。

群首领的分裂活动和独立思潮，另一方面他仍始终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记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削弱这种意识**”¹。所以，在孙中山的潜意识里，他不赞成在中国实行“民族自决权”并明确反对采用联邦体制。

1911年梁启超先生曾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讨论过中国的体制问题：“联邦制所最难处置者，则蒙、回、藏诸藩疆也，使彼等能各自为邦以加入联邦中，岂非大善……然我诸藩疆与本部之关系**平昔本已阂隔，尔来强邻介煽，久已生心外向**，今若非别有道以维系之，则惟有俟戡难之后，陈兵镇抚，窃恐此愿未偿，而物已非我有矣。此忧国之士所最宜兢兢也”。梁启超反驳当时一些人提出的联邦制主张：“我一放弃，则诸藩不能自保，势必将有所属，泰东之均势一破，则本部金瓯，又安能保……故今者建设伊始，当刻刻以蒙、回、藏、疆为念，务使不自屏于中国之外。”²从这段话里，也可看出当时因为“强邻介煽”，诸藩疆“久已生心外向”。当时如果中国采用联邦制，则不仅危及国家统一，边疆各部也必将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其民众亦难免受奴役之苦³。

孙中山与北洋政府彻底决裂后，曾积极寻求日本和美国的支持。在相关努力失败后，他开始转向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府。因为苏联政府曾经宣布放弃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的所有领土，引发中国民众的好感。1923年1月26号，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中山越飞宣言》，苏联答应在1926年广东军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之前，向孙中山提供资金与大量武器⁴。1923年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广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就在此前不久的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公开提出中国政府应当在国内实行“民族自决”原则，“不仅要求国民党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允许少数民族分别建立独立国家，而且要求中国国民党放弃对国内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等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再‘自由联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⁵。虽然“民族自决权”是列宁有关民族问题论述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一政治要求，实际上是在明确支持苏联政府在中国北部拓展自身领土的既定战略，具体指向就是外蒙古地区。

1922年苏联红军以剿灭白俄军队名义进入外蒙古，驱逐了北洋政府在外蒙古的官员和驻军。同年控制了外蒙古全境，建立一个亲苏的蒙古人民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事态背景下，1924年1月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表态，接受“民族自决权”这一立场：“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宣言》似乎支持了外蒙古享有自决权及独立建国的权利。当时站在反对北洋政府立场上的孙中山，似乎并不那么关心外蒙古是否独立出去，而是急切地希望由他领导的广州政府能够获得苏联政府各项财政与武器援助以推进北伐战争。这很可能就是他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国际1923年的上述《决议》，并在“一大宣言”中接受了“民族自决权”的主要原因。

在国民党一大宣布“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几个月后，1924年6月“蒙古人民共

¹ 孙中山，1922，《对外宣言》，《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28-529页。

² 梁启超：1911，《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二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34页。

³ 张春海，2023，“自边缘建构民族国家——民国时期‘联邦’‘自治’制博弈下的法制设定”，《南开史学》2023年秋季号。

⁴ 约计1,000万元卢布、步枪5万支、子弹5,000万发、机枪1000挺以及少量重炮飞机坦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0907/11/19248296_1046876671.shtml (2023-8-28)

⁵ 熊芳亮，2016，《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社科文献出版社，第53页。

⁶ 荣孟源主编，1985，《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第6-17页。

和国”在苏军支持下成立，公开宣布与苏联结盟。此事随即在中国各地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一致认定苏俄政府是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政权，十月革命后因“加拉罕宣言”曾引发的中国民众对苏联政府的好感瞬时荡然无存，因“外蒙古独立”事件引发的各界抗议浪潮遍及中华大地。但是，孙中山此时却仍然保持与苏联政府的密切合作。

据学者考证，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具体内容是在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主导下起草的，当时对于其中的部分内容，“孙中山本人也并不赞同甚至明确表示反对”¹。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出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的提法，是孙中山与鲍罗廷妥协的结果。此时，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希望位于广州的国民党南方政府能够承认外蒙古的“民族自决权”并放弃干预外蒙古事务²。这即是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的国际政治大背景。

与此同时，1921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因为接受苏联的指导，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宣称：“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³。在这些早期文件中，刚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和“联邦制”建国纲领。

为了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民意方面获得一些支持，以改善苏联在国际上的外交形象，在1922年苏军侵占外蒙古后，俄共即要求中国共产党正式表态支持“蒙古独立”。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起召开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团体均有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蒙古代表团就中国与蒙古的传统关系对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出乎意料的猛烈抨击。国民党代表奋起维护‘中国’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却陷入两难，被迫采取与共产国际一致的观点”⁴。

1923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在“蒙古问题”一节提出：“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主之客观的可能”⁵。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致蒙古境内工人书》中，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蒙古独立是应该的，……我们工人应该赞成蒙古独立，不仅只消极的赞成，而且要积极的帮助。假使中国国民党军阀进攻蒙古的时候，中国工人应该站在蒙古一边，帮助蒙古反抗中国国民党军阀。……拥护蒙古独立！”⁶。这一政治表态完全迎合了俄共中央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更反映了俄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国际主义和本国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再权衡⁷。

三、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军队悍然侵占东三省及呼伦贝尔等地区，以清朝退位皇帝溥仪的名义建立“伪满洲国”。随后日军又进攻热河和察哈尔，联络察哈尔的德王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军强行进驻河北各地并包围平津，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进一步把占领区扩大到华北地区。

¹ 熊芳亮，2016，《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社科文献出版社，第44页。

²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曾希望由苏联协助在外蒙古建立一所军校和训练一支军队，以便从外蒙古出发，南北夹击北洋政府。因为担心中国力量介入外蒙古，这一提议被苏联拒绝。

³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8页。

⁴ 刘晓原，2018，《边缘地带的革命：中国民族政策的缘起》（1921-194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29-30页。

⁵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5页。

⁶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3-114页。

⁷ 马戎，2019，“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第89-107页。

继“伪满洲国”和“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又积极开展所谓的“回教工作”，派出人员深入甘青宁等西北地区联络回回军阀。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一份指导性纲领《时局的发展与对支谋略》，确定了对华军事战略、政治攻势（如分化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等）和加强在华经济掠夺以支援战争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¹。日本驻承德代理领事在给外务大臣拍发的“绝对保密”的电报中，对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意义做了如下解说：“与满洲国的二百万回教徒保持联络”；“将该地作为回教徒的防共本部，并以此为中心，不仅与满洲国的而且与一千万支那回教徒进行团结，支援五马联盟，力图与中亚各国回教徒取得联系”。“对政治工作员（即义勇军）进行武装，首先支援五马联盟，使其从蒋政权中完全独立出来，然后进入中亚，促使该地区各国独立或排除第三国的影响，在皇国之慈光下完成东洋的皇道联盟”²。所以，顾颉刚先生1939年提到日本企图在我国西北地区成立“回回国”，完全有事实根据。1938年西北马家军阀中的马麟在日本人利诱下公开投日³。“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集团，发起了新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⁴。

在此国难当头危急时刻，如果还是延续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和“五大民族”的提法，或者简单地从西方学术界的某些概念出发，以族源、语言、宗教差异等为标准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苗等许多群体称作“民族”，这样的话语体系和群体认同意识建构，在客观上即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活动和文化渗透，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是否需要“五族共和”和“五大民族”这样的“民族”话语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当时有些爱国学者如傅斯年也曾为此大声疾呼⁵，认为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应当对“民族”这个在中国社会已经约定俗成的核心概念进行必要的反思⁶。

在民国时期，关于“民族”这个具有极强政治意涵概念的一次大讨论，发生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1939年。1931年和1932年“伪满洲国”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相继成立，1937年、1938年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汉沦陷，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取道越南投靠日本，随后在南京成立了汉人伪政府，指挥投降日本的上百万伪军协助日军作战和“清乡”。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又积极在西北甘青地区加紧活动，筹划“回回国”。当此抗日战争态势日趋严峻之际，顾颉刚先生1939年2月在《益世报》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正面讨论“民族”这个核心概念。文章发表后随即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一场大争论。

该文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⁷。针对当时国内受西方理念影响而把汉、满、蒙、回、藏等各族之间存在血缘和文化差异而区分为不同“民族”的观点，他明确表示，这些差异都不应成为否认“中华民族”的理由：“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⁸。他在文章中举出大量事例来佐证

¹ 王柯，2009，“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87页。

² 王柯，2009，“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93页。

³ 马麟是马步芳的叔父，曾担任过青海省主席，但在1935年的权力斗争中输给马步芳。

⁴ 王柯，2009，“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5页。

⁵ 傅斯年1932年出版《东北史纲》，以驳斥日本有学者提出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说”。

⁶ 娄贵品，2023，“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中的关键作用”，《昆明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⁷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⁸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这一观点，认为“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¹。“中华民族”包括居住在中国境内所有“汉”和“非汉”群体，它们共享一种经千年相互交流融合而成的“混合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同时，顾先生也明确表示反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他把“汉”视为一个几千年融汇各族而成的一个混合体：“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有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²。

1939年，顾颉刚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民族”这个重要概念辩论清楚。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当“民族”这个概念被套用到内蒙、藏、回、满各群体头上后，在各族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方面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族际矛盾。“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现在我们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³。他在文章中详细讲述自己与推动“民族自决”的内蒙古察哈尔德王之间的交往经历，以及在西北各省访问时有关当地回汉民众冲突的所见所闻，“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⁴。

如果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都被称作是不同的“民族”，那么在人们在交往中必然产生不同“民族”之间的群体界限：“你的民族”和“我的民族”。因此，各“民族”会具有不同的核心利益和不同的政治诉求。在这样的新格局下，中华民族内部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的政治文化认同格局自然难以延续。正因为面临这种前景，顾先生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⁵。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坚持呼吁要厘清“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探讨，在当时具有非常强烈和紧迫的政治意义。

这篇文章发表后，因为涉及到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究竟应该如何定义，随即在国内学术界引发激烈讨论。众多学者如费孝通、白寿彝、翦伯赞、杨成志等均参与其中。费孝通先生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强调“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也不必否认这些团体是“民族”。费先生认为防止国家分裂的办法，并不在于各群体是否被称作“民族”，而在于如何实现群体之间的平等。他指出：“若是我们比较苏俄国内民族共处的情形，再看拥有殖民地的列强一面侵略人家，一面压迫小民族的情形，使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内部发生民族间的裂痕，并不在民族的不能相处相共，而是出于民族间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若是有不平等，不论不

¹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²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³ 顾颉刚，1939，“‘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⁴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⁵ 顾颉刚，1939，“‘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平等的根据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语言上的或体质上的，这不平等的事实总是会引创裂痕的。易言之，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¹。

费孝通先生强调各群体在政治上的平等，这一点当然绝对正确。假如各群体之间因为经济、文化、语言或体质差异的原因出现了政治上、权益上的不平等，那么，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很自然地不希望继续留在这个在制度或法律上歧视和压迫自己的政治实体中，并试图寻求政治独立，于情于理都是如此。但是1939年中国的形势似乎并不如此简单，这一条原理未必是导致抗战时期中国面临分裂危机的主要原因。满洲国的建立并不是因为东北的汉人歧视和压迫满洲旗人，德王策动的“内蒙古自治”也不是由于察哈尔的汉人歧视和压迫蒙古人。这里固然存在外部势力的怂恿、策划甚至直接推动，但是假如不是在“民族意识”上已经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清晰区分与隔阂，这些分裂活动就不一定会以“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形式出现。

杨成志先生分析了中国学者所用“民族”一词的英文源头：“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主张”²。杨先生的解析一语中的。其实，如果我们把人类学者使用的ethnicity译作“族群”，把ethnography译作“族群志”，顾、费二人思路差异之源便十分清楚。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历史学是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各自所注重的方面自然也很不相同。如果用学科背景来加以解读，二人的分歧可基本化解。自2000年以来，笔者一直提议保持“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称谓不变，而把我国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民族”改称“族群”³。这个思路也正是试图避免把“民族”这个关键的核心概念应用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层面（即同时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称作“民族”）。在现代国际学术体系中，“民族”（nation）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而“族群”（ethnic group）则更为普遍地用于在族源、语言和文化习俗保留自己传统的各类群体的泛指，既可以用于历史上的群体，也可以用于不同国家体制内的群体。

1939年在学术界发生的这次影响广泛的学术争议，应被视为我国学者对汉文“民族”这个重要概念应当如何解读和使用的第一次大讨论。相关文献至今仍是我们梳理中国“民族”概念史的重要素材。

三、蒋介石提出“宗族论”与“国族”概念入宪

抗战期间，为了避免把“中华民族”与国内满、蒙、回、藏等同时称为“民族”，当时也出现把满蒙回藏等群体称为“种族”“宗族”“支族”“部族”等多种提法⁴。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一文中，顾颉刚称满、蒙、回、藏等为“种族”：“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nation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nation。他们如要取得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⁵。在当年的大讨论中，费孝通先生认为“种族”（race）概念多用于指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体质差异，用于称呼国内的满蒙回藏诸族并不妥当⁶。这在体

¹ 费孝通，1939，“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² 杨成志，1939，“国族政策与民族政策之分类与关系”，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³ 马戎，2000，“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35页。

⁴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8页。

⁵ 顾颉刚，1939b，“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4页。

⁶ 费孝通，1939，“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

质人类学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顾颉刚先生之所以不赞成用“民族”一词称呼满、蒙、回、藏等群体，完全是为了避免附和日本人把这些群体冠之以“民族”，以此分化和架空“中华民族”这个国族共同体。他基于爱国情怀的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有意在政治范围内淡化‘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概念。例如从1938年8月开始，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进行改革，规定‘将含有侮辱之名词，一律予以改正，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宣传品等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县人等，如此则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原籍西藏者，可称为西藏人，其他杂居于各省偏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称为某某省边地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政府淡化‘民族’称谓背后隐藏的中央政治权威重建的意图：化民族称谓为地方称谓，即政治权威一体化的过程”¹。南京政府以各族国民的家乡籍贯或出生地来代替已开始流行的“民族”标签，希望以此能够淡化“民族”意识，从而强化“国民”意识，这是国民政府在全体各族国民中努力淡化“民族”区隔的一个思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关头，中国社会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努力在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加强全体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推动全民抗战。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却始终继续努力进一步通过推动“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华民族的抗日阵营。1939年日本军部把在华北成立的3个“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同时积极鼓动甘青宁地区回回军阀成立“西北回回国”。1941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抗日战争面临一个严峻时期。此时由苏联途经新疆、甘青联结重庆大后方的抗日物资运输的西北通道，对于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为了稳定甘肃、青海等回、藏民族聚居区的政治形势，1942年8月蒋介石专程飞抵西宁。他在对当地各族首领讲话时提出了此后颇有影响的“宗族论”：“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哪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相互关联的。就我们对于国家的关系而言，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能享受平等的权利。至于国内各种宗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构成的一种要素，政府自然要保障人民信教的自由，而无所轻重。”²

上述观点在蒋介石一年后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述得更加清楚：“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轹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³。

蒋介石把满、蒙、回、藏等称作“宗族”而不称作“民族”，多少承袭了孙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中的观点。在国家层面，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即是国族”，在国内群体层面，他指出“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现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

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2-68页。

¹ 崔珂琰，2017，《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92-93页。

²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6-307页。

³ 蒋介石，1943，《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第2，5页。

联络得多”¹。孙中山这里所讲的“宗族”，主要还是指汉人社会中的宗族，但是在1942年，被蒋介石用来扩展到指称边疆各部落群体²。这反映出在当时一些国家政治精英的观念中，边疆地区人群的社会结构与汉族的“宗族”是大致类似的。同时，蒋介石避免把满、蒙等称为“民族”，多少也受到了顾颉刚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影响。但是，对于1939年顾颉刚把国内满、蒙、回、藏等称为“种族”，蒋介石对此并不认同。他觉得满、蒙、回、汉等群体在体质上的“种族差异”并不突出，在西方人眼里都是差异不大的“黄种人”。因此，蒋介石宁愿将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族视为“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出于对华侵略的潜在野心，一直在向中华各族灌输汉、满、蒙、回藏等都是不同的“民族”，而且彼此“在历史上互有仇恨”，“根本利益完全冲突”等观念，这些舆论造势都是直接为其分化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满洲国”“蒙古自治政府”“南京汉人政府”以及潜在的“西北回回国”等，都是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分化舆论战的过程中依次推出的“政治实体”。有鉴于此，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全面抗战时期，不愿或避免称少数民族和汉族为‘民族’，以免与整体的‘中华民族’发生矛盾，并非1940年前后蒋介石一个人的意向，而是国统区不少人共同的关切，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一度几乎占据了国民党和国统区舆论的主导地位”⁴。这即是顾颉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之所以得到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支持的原因，也是随后《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得到民众情感上的迅速回应并很快即流行于全国的认同意识基础。

由于“民族”概念直接与西方流行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政治倾向相联系，国内社会和知识界大多不倾向于使用“民族”概念来称呼满、蒙、回、藏等群体。那么，究竟应当采用哪一个词来称呼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提出了“种族说”，汪少伦提出了“支族说”。毛起鹄、刘鸿焕则提出了“部族说”：“汉、满、蒙、回、藏、苗……并不是民族单位，只不过代表中国境内生活、习惯稍有不同的各种人，他们都只不过是组织中华民族的各支系，所以叫他们为**部族**，是最适宜不过的”⁵。毛起鹄认为：“民族为政治的结合，部族则为非政治的结合。政治的结合最高形态为国家为民族所应有，却非部族所必需”。他指出由于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普遍的族际通婚，中华内部的各族“彼此同一血缘者多，而非同一血缘者少”⁶。在上述争论中，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避免使用“民族”来称呼国内各族的替代物。蒋介石提出的“宗族论”在当时也是选项之一。

蒋介石提出“宗族论”后，很快即得到了不少著名学者的支持，如罗家伦、俞剑华、岑家梧、罗常培等。中国边疆学会创办者之一的黄奋生1944年在《新中华》上撰文称：“‘宗族’名称的建设，使国内各宗族，都能直觉的明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同一血统的一个宗支，有共同的命运。这于民族团结上，将会收到莫大的效益，并可免‘民族’二字的误用，尤其可以免去帝国主义者对于各宗族挑拨分化的口实”⁷。这段话明确表示，作者认为把“民族”概念用于国内族群是“误用”，也表明当时在指称国内汉、满、蒙、回、藏诸群体时，人们之所以避用“民族”而选用其他词汇所具有的深层次政治考量。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把中国各族都称为“民族”并直接鼓动它们“自决”？而国内有些人主张用“民族”来定义满蒙回藏？而另外一些人又极力避免使用“民族”，并宁愿选择“种

¹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8页。

² 熊芳亮，2016，《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104页。

³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4页。

⁴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8页。

⁵ 毛起鹄、刘鸿焕编，1942，《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第50页。

⁶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4页。

⁷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10页。

族”“支族”“宗族”等其他词汇？究其深层次原因，脱离不开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大背景。一方面，此时“民族”一词在国内外的通用话语中已经带有很强的政治内涵，并与“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分裂中国的潜在政治导向联系起来。同时，国内有识之士在日军的各种宣传鼓动中，已清楚地看到，这是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为中国人构建的“分裂陷阱”。其实，在这个历史时期，只要不把满、蒙、藏等群体称作“民族”，相关称谓不带有分化“中华民族”的政治色彩，那么，无论选择其他什么名称，也不论其在学术论证中是否“准确、科学”，其实都无关紧要。所以，蒋介石提出的“宗族论”，“虽直接、间接地体现了蒋介石政府的政治意志和文化高压的影响，但也确实成为那一时代应对时局、寻找民族和国家出路的不容忽略的民族文化思潮之一。”¹

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把国内少数群体称作“宗族”，而不是“民族”，在当时也曾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不满²。其主要原因也很清楚：首先，“宗族”等概念在历史上并没有用来称呼满、蒙、回、藏等群体，汉人内部的“宗族”通常被理解为血缘姓氏集团（这也是孙中山的解读），而蒙古人、哈萨克人对“宗族”的理解更近于本族内部的部落。因此，“宗族”概念与各族对自身整体称谓的传统理解并不相符；其次，这一提法也使得各边疆群体今后在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和文化地位时，难以再使用“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等口号来进行政治动员和权力博弈。

1943年是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掀起“反共高潮”、摩擦不断的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很快便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蒋介石的“宗族论”也被指责为“大汉族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³。陈伯达在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批判的重点是蒋介石书中强调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及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污蔑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被视为蒋介石集团为抗战结束后发动反共内战在做舆论准备，蒋的图谋在其后对各共产党领导下各根据地军事进攻中付诸行动。我们在此处所关注的，仅是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当时中共领导人所持的民族观。

陈伯达在该文中说：“平日我们习用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并特别指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⁴。首先，该文强调“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所以，今天有些人拒绝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实体，而视其为各“民族”的总称，在历史文献中是有理论根据的。另外，陈伯达文章明确提到“民族”定义：“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条件）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这即是斯大林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陈伯达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秀才”，他的这篇文章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深刻影响。

在当年国内有关“民族”概念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名词就是“国族”。由于孙中山享有崇高威望，《三民主义》一书在民国时期成为社会普及政治读物。孙中山强调“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以“民族”、“国族”以及其他与“民族”相关的多个概念曾同时流行于社会。1931年“中华国族”一词出现在《申报》，随后“国族”一词再次受到关注并进入政府公共政治话语。1936年5月，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主持制定的《五五宪章》公布，第一章

¹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12页。

²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9-314页。

³ 毛泽东，194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083-1084页。

⁴ 陈伯达，1943，《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总纲”首次写入“中华国族”，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¹。这就是当时曾引起全民热议的“中华国族入宪”。

当时一位立法委员陈长蘅曾留学美国，他“主张明确称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同时把‘中华民族’改为‘中华国族’”²。他的主张是：一方面承认满、蒙、回、藏等均为“民族”，另一方面则改称“中华民族”为“中华国族”。针对当时国内涉及“民族”概念的不同解读和争议，他提出了一个“国族-民族”双层结构的调整方案。在同一时期，袁业裕、吴文藻、吴泽炎等多位学者也纷纷撰文讨论“国族”概念³。1942年毛起鵠、刘鸿焕编写的《我们的国族》一书中，反复使用“中华国族”概念。但作者坚称“国族”和“民族”“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的范畴”，因此该书没有把满、蒙、回、藏等称为“民族”，而称作“部族”⁴。

民国时期，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来自西方的“民族”一词以及这个概念应当如何应用于中国，哪个层次的群体应当被称为“民族”，相关讨论始终在进行之中。人们先后提出“民族”“种族”“部族”“宗族”“国族”“支族”“氏族”等多个名词，但是究竟应当使用哪一个概念来称呼国内满、蒙、回、藏等各群体，学者们始终没有真正达成统一的意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地相继沦陷，中国所有出海港口全部被日军攻占。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日军在占领区的残酷“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深刻地教育了日占区的各族民众，也进一步唤醒了全体国民的现代“民族”意识。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后，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即流行于全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在每一个歌者和听众心中都点燃了爱国主义的火焰和抗日救亡的激情，“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也随着这首歌曲的传唱而融入了全体国人的心田。尽管“民族”“国族”这些具体用词在学术界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却因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华民国的37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当前，中央决定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求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民族”“中华民族”“56个民族”这些中国民族研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讨论清楚，没有把这些核心概念的演变与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前人已有的理论探索结合起来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那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构建全体国民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基础性工程，在理论上就始终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

¹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18页。

²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20页。

³ 郑凡等，1997，《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第59页。

⁴ 毛起鵠、刘鸿焕编，1942，《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第2页。

【论 文】

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¹

张 弘²

【内容提要】自获得独立以后，乌克兰社会就面临着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乌克兰的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可以理解为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不仅要进行民族-国家的重新构建，而且还要进行民主-国家的构建。社会的转型造成了乌克兰社会在历史宗教文化上的认同矛盾，经济发展上的道路之争，在政治上的民主危机。这三个方面的矛盾演化成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通过分析乌克兰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笔者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政治家如何去处置。乌克兰政治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过激言行是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差异问题演化成为危机的关键，而民族认同危机又增加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俄罗斯；乌克兰；国家认同；社会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一般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含有多重意义的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³。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定义应为：国民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边界、制度、价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种自觉的认可和接受。民族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认同，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国家政权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情感，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⁴。

本文将国家认同问题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冲击了原有社会中的国家认同，在新的社会形态中需要重新构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转型是一种由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向现代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历史图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领域由专制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文化的转型⁵。

因此，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来说，不仅需要建立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需要建立起稳定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它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二是民主-国家，它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⁶。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稳定和完整都受此影响并出现了新的认同危机问题，需要重新选择发展方向和进行自我定位。此外，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

¹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1-9 页。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³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15 页。

⁴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 1 期。

⁵ 李钢：《论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意义》载《求实》2001 年第 1 期。

⁶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载《东南学术》2006 年第 4 期。

内部族裔向原有的民族认同回归，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也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认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独立后的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有些模糊和混乱。因此，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国家构建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新构建，而且还包括民主国家认同的构建。二者在所有形式的集体认同中，是最具根本性和包容性的要素。

二、乌克兰面临的认同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它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经历一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原来的体系。影响国家认同的各种基本要素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认同¹。因此，本文中对乌克兰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族群文化认同和民主认同。

独立以来，乌克兰社会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同差异。这种认同差异在政治家的激烈言行的动员下演化成为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最直接和最明显地表现是对乌克兰国家利益的认同，即“什么是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民族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乌克兰出现社会分裂和民族矛盾。在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引发了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的对立和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激烈的街头斗争。在2010年总统大选前许多乌克兰国内政治分析人士曾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当是影响乌克兰选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计票结果显示，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州都支持亚努科维奇，而乌克兰族占绝对多数的州则都支持季莫申科。可见，乌克兰国内缺乏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统一的国家性政党，主要政党实际上已经沦为地区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影响选民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因素。选举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实质上是乌克兰国内潜在的国家认同危机。同样，在2010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优惠天然气换取黑海舰队基地续约协议后，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民众拥堵在议会外表达支持，而来自西部的民众则在政府大楼前表达抗议和不满。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认为：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²。

（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危机

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³。独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乌克兰曾经的统治者都对乌克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原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在乌克兰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在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也由此而来。尽管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化”。有人甚至把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意指它在种族、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上，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永远的区域

¹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

² 笔者于2010年4月28日访问乌克兰期间专门拜访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先生，他就乌克兰与俄罗斯天然气合约和黑海舰队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

³（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性裂痕¹。首先，如何真实地还原乌克兰历史及认识族群认同危机。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历史的问题，在乌克兰社会和历史学界产生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深层次上是如何认识乌克兰过去的问题，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以乌克兰人的视角来考察乌克兰文化和历史，特别是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时期的历史，对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构建尤为重要。在近代，大俄罗斯主义一向坚持从喀尔巴阡地区到太平洋区域内居住着操同一俄语、具有同样历史传统的、统一的俄罗斯人学说。约在12~13世纪，“乌克兰”（本意为“边区”）一词开始使用，随后，这一称谓逐步扩大到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以这一称谓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然而，乌克兰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土地分别被划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版图，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1648年，乌克兰人民在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领下起义，反对波兰的统治。为了获得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帮助，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表示愿意服从沙俄的领导。1654年3月，双方签订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基本条约》，亦称《三月条约》。与俄罗斯的结盟也成为乌克兰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乌克兰历史发展的轨迹由此转向了俄罗斯。此后200年间，沙俄一直牢牢控制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沙皇彼得大帝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重新构建乌克兰社会结构。沙俄用刚柔并济的办法，同化了乌克兰上层统治阶级，确立俄语的官方地位，把乌克兰语贬为“乡巴佬”语言，禁止乌克兰文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强制乌克兰人抛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1917年，沙俄爆发了“二月革命”，帝国瞬间解体，但随后成立的苏联政权继承了沙俄在乌克兰的一切权力。

乌克兰从属于沙皇俄国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而在沙皇俄国，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所谓“南俄历史”无偏见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全都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的沙皇当局的怀疑和迫害。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将它改为“统一而牢不可破的联盟”，以“俄罗斯救星论”和“美化大俄沙文主义”，推行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针。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官方的乌克兰史学。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义者”。这类意识形态的整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反复进行，许多乌克兰史学家受到谴责，罪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指民族分裂主义。这种政策在苏联史学界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的独立标志着苏联官方修正史的终结，但乌克兰史学政治化的后果异常严重，至今影响尚存。

在1991年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其实远未成熟，更不要说国家认同感。乌克兰某些领导人重新启动对乌克兰历史，特别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打开了乌克兰历史中沉寂多年的历史文化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围绕如何重新评价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苏联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和大清洗运动等历史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乌克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而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指出当时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在内的俄罗斯很多地方也发生了饥荒；这是一场悲剧，没有针对哪个民族的预谋。2003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卡梅宁也曾在联合国第58届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俄政府的立场。卡梅宁指出，俄罗斯政府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的是大饥荒，而不是“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尤先科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进对苏联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历史清算。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从而再一次唤起人们对发生在73年前的那一悲惨事件的痛苦记忆。其实乌克兰社会内部对于大饥荒的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亲俄罗斯的议员认为该决议会招致俄方的不满。在这个决议的投票中，有450个席位的乌克兰议会中，只有234

¹ Oleksandr RARA Ukrainian Ri f tin “ The Day”16November2004.<http://www.day.kiev.ua / 127579 />

人参加了投票,勉强超过半数。最终该决议以 233 票赞成,1 票反对获得通过。很多议员在这一敏感问题上选择了回避和沉默。尤先科总统在 2010 年卸任前授予乌克兰有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也是引发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西部认为,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¹。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亚努科维奇就表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尤先科的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重新研究这些历史不仅让今天俄乌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也在乌克兰社会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其次,特殊的分裂历史造就了乌克兰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民族宗教是在某种特定的族群社会传统中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决定了特定的宗教生活。民族认同大都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作为基础,宗教认同作为民族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无疑是民族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它们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渗透于它所在族群的政治、法律、经济和道德生活之中,并相应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目前,乌克兰主要的宗教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信徒约占人口 85% 的比例,天主教约占 10%,其他的还包括浸礼教、犹太教和马蒙教等。历史上,乌克兰曾经长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东正教会,即听命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拜占庭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17 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乌克兰推行“天主教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发起反抗,并且寻求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 1654 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乌克兰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一些地区曾经被不同的外族政权统治,因此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完整的历史。14 世纪中叶,立陶宛公国吞并了南罗斯,即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使基辅东正教总教区与俄国的总教区分离,而臣服于拜占庭教皇,这就是乌克兰东正教。1448 年俄罗斯东正教拒绝服从拜占庭牧首而宣告独立,这样在乌克兰就存在服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1654 年东乌克兰划归俄国后,乌克兰东正教的基辅主教又逐步脱离拜占庭,于 1686 年臣服于莫斯科主教。20 世纪初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成为依附于苏维埃制度而独立于梵蒂冈的宗教。进入 80 年代末,随着乌克兰争取独立步伐的加快,被禁止和处于地下的乌克兰自主正教重新开始活动。1990 年 10 月乌克兰自主正教教会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宣布乌克兰自主正教独立于莫斯科东正教牧首。这样在乌克兰,东正教又分为忠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宗教礼仪使用俄语,而乌克兰自主正教的宗教礼仪则使用乌克兰语。两个东正教教派分裂时,曾就如何划分东正教教堂和财产发生争执。但在 1992 年中期,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合并,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到了尤先科总统执政时期,这个问题在 2008 年又被重新提出。

在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总统积极推进乌克兰宗教文化的“去俄罗斯化”和“脱俄入欧”运动。2008 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 1020 周年之机,正式向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olomew 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其目的是要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尤先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

¹ 斯捷潘·班杰拉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二战前曾因参与谋杀波兰政府高官,被波兰方面抓捕入狱。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被释放,并随即聚集起一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德军入侵苏联后,以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依附纳粹攻击苏军。不过,试图依靠德国恢复乌克兰独立的班杰拉在希特勒那里并不吃香。1941 年德军进攻苏联战役打响后不久,班杰拉就被软禁起来,后来又被送到集中营。但是,由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党卫军加西利亚师,仍然为纳粹效力,并参与了 1944 年镇压华沙起义的行动。1959 年 10 月 15 日,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苏联克格勃击毙。

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乌克兰的宗教认同差异虽不是对抗性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但人为地制造宗教认同的分裂实际上强化了乌克兰社会族群认同的差异。

最后，语言政策改革引发的族群矛盾。原苏联国家在获得国家主权独立之后，积极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维护自己的民族特征、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的努力是可以被尊重 and 理解的。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产生和形成有其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在这些国家里完全取消俄语的使用也是不可能的。独立前乌克兰学校的教学以俄语为主（占 90%），乌克兰语教学只占 10%，当时苏联的政策使乌克兰语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 1989 年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当时苏共中央非常反对，乌克兰经过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这部法律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很大利益。乌克兰独立后，从 1992 年起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国语，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这个修订案虽经议会多次讨论，但直到颜色革命后的 2006 年才获得通过。独立以后的乌克兰政府积极推进乌克兰语的使用，逐渐把俄语挤出该国的教育系统和政府与国家媒体之外，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乌克兰中学中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学校的比重%

| 年份 | 1991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1 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 | |
|--------|------|------|------|------|------|------|------|------|-----------------|------|
| 乌克兰语学校 | 45.0 | 60.0 | 62.7 | 65.0 | 67.5 | 70.3 | 72.5 | 73.8 | 乌克兰族 | 77.8 |
| 俄罗斯语学校 | 54.0 | 39.2 | 36.5 | 34.4 | 31.8 | 28.9 | 26.6 | 25.3 | 俄罗斯族 | 17.3 |

数据来源：转引自俄罗斯国际人文政策政治研究所乌克兰分所根据乌克兰科学与教育部数据研究得出的成果¹。

近年来乌克兰语面临来自俄语、英语的冲击，因此政府特别重视和加强乌克兰语的规范工作。截至 2008 年的数据，乌克兰全国有 21500 所学校，其中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教学（69.7%），有大约 1305 所学校用俄语教学，还有 2000 多所学校用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乌克兰的学校里共有乌克兰语及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鞑靼语、希腊语等 18 种教学语言）²。乌克兰政府在许多公共生活领域推行乌克兰语和文化的同化政策，以消除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影响，以及一些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化和罗马尼亚化影响。大多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国民以俄语为母语，俄语是全乌克兰中最通行的第二语言。不过，乌克兰中部和西部使用俄语的情况远不如东部和南部。现在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俄语至今并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在乌克兰说俄语者仍然不在少数³。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讲俄语的俄罗斯族裔和以俄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乌克兰人十分不满政府强行推广乌克兰语的政策，特别是在政府在逐渐减少对俄语教育的支持，以及限制俄语媒体在乌克兰的播出政策。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每当乌克兰举行选举时，很多政客都承诺把俄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但是选举过后，这些承诺往往又被政治家们选择性的遗忘。尤先科执政时期实行的激进和强硬的语言政策造成乌克兰中部、东部和南部讲俄语居民的不满，进而招致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裔选民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抵触和矛盾。“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政府要求人们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现在学校同教师都订有合同，要求教师用乌克兰语讲课，否则可能被解聘。乌克兰的实践显示，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

¹ 数据来源：Директор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МИГПИ Д—РВладимирМалинкович10Марта2005Г. <http://www.igpi.ru/info/people/malink/1111152776.html>

² 根据乌克兰 R & B Group 调查公司 2008 年的民调数据 <http://www.regnum.ru/new/964262.html>

³ 根据乌克兰 2001 年人口统计,大约占总人口 29.3%乌克兰国民以俄语为母语。

策并不一定必须实行单一的国家语言政策，强制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反而有可能扩大族群之间的认同差距，不利于同一的国家认同构建。

综上所述，乌克兰在历史、宗教和语言等问题的认同差异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特点。乌克兰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居民讲俄语居多，信奉东正教，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要讲乌克兰语，多信奉天主教，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对俄罗斯统治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敌意。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因此也传导到国家未来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问题上来。乌克兰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乌克兰国家认同差异衡量的指标。根据乌克兰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乌克兰东部 81%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乌克兰中部 66.9% 的受访者和南部 46%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而乌克兰西部 55% 的受访者则认为俄罗斯是敌对国家¹。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开始奉行乌克兰化政策，迫切地希望实现从大俄罗斯民族文化到乌克兰民族文化的转变，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乌克兰化政策是对历史上的外来政权强加给乌克兰社会的非乌克兰特征的矫正，主要内容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和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本身就是“乌克兰化”的代名词，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

（二）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引起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

乌克兰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日趋明显。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20 世纪 90 年代广泛的私有化后果是，金融工业寡头控制了乌克兰主要经济命脉。有别于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金融工业集团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更加严重，而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根据乌克兰顶级商业杂志《记者》2008 年 6 月 2 日的报道，乌克兰最富有的 50 个金融工业寡头的资产总值已经达到 1120 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两倍。这些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乌克兰经济命脉，而且还直接决定着乌克兰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命运。他们通过资助乌克兰主要政党或者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和外交。金融工业寡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集团：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目前顿涅茨克集团在政治上更倾斜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保持距离，而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由于自身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倾向于与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乌克兰全国人口为 4800 万，大体上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东乌克兰毗邻俄罗斯，人口 3200 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而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西乌克兰毗邻欧盟，人口 1600 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经济比较落后。1999 年，从俄罗斯经济有起色以来，与俄罗斯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东乌克兰地区也恢复了经济活力。相反，西乌克兰地区经济起色不大。乌克兰经济东、西部发展失衡，东部要求密切与俄合作，而西部希望尽快融入欧洲。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和欧盟，传统优势出口商品是冶金、化工、机械、军工产品，而这些工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仅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乌克兰全国的 60%~70%。此外，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主要是波兰等国，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乌克兰西部地区被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每年因此损失数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决定，前者要求密切与俄的合作，而后者希望尽快融入欧洲。

经济利益决定了东西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而且这一因素今后还会更加突出。市场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单位化调控体系逐步让位给社会化调控体系，各种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争夺与对抗。传统的乌克兰社会分层出现严重的分化，各种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利益

¹ Пироженко В. Состоя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сферы Украины // “2000”. 27 января 2006.

的认同也从模糊统一到清晰分化。不同的历史记忆及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倾向成为乌政局动荡的根源。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形成了国内林林总总、数目繁杂的次国家组织和团体，他们即使不寻求独立，也对国家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乌克兰社会对于国家民主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道路认识的分化是国家认同危机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国家构建中的民主危机

乌克兰在社会转轨过程中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是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监管缺位、公民社会力量薄弱以及过于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真正有效地运行起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政党政治。

首先，频繁爆发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经在 2005 年 2 月议会中指出：“源自高层的腐败曾一直是乌克兰的头号问题。”¹ 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报告，乌克兰从 2000 年到 2005 年期间一直是腐败指数居高不下的国家。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所 2004 年报告，乌克兰的反腐败指数从 1996 年的 26.7% 下降到 2004 年的 18.7%，这说明库奇马执政时期的乌克兰腐败情况出现了恶化²。目前已经被公开的案例就有直接指向曾担任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腐败案和曾经担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谋杀案。乌克兰检方在 1998 年指控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利用职权侵吞了上亿美元的乌克兰国有资产。1999 年，美国当局应瑞士和乌克兰的要求，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将他逮捕。2000 年 6 月，美国政府以通过美国银行洗钱、勒索、欺诈和转移盗窃财产等罪名对拉扎连科提起诉讼。2006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以洗钱、欺诈和勒索等罪名，判处拉扎连科 9 年监禁，并处以 1000 万美元罚金。2000 年 11 月，以批评政府高层腐败问题而著称的乌克兰著名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突然遇害。随后，舆论纷纷指责时任乌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与此案有关。乌克兰社会党领袖莫罗兹宣布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是“贡加泽案”的幕后主谋。莫罗兹称，国家警卫局军官米科拉·梅尔尼琴科向他提供了自己秘密录下的库奇马在 1998~2000 年间在自己办公室内的数百小时谈话内容的录音带。在这些录音带中有库奇马总统、总统办公厅主任利特温和内务部长克拉夫钦科三人的谈话，上面记录了当时他们正在秘密商议除掉贡加泽的办法。在贡加泽遇害两周年之际的 2002 年，乌克兰反对派再次组织大规模的“乌克兰不要库奇马”运动，要求库奇马下台。虽然库奇马成功克服了有关针对他本人的各种腐败指责，但腐败丑闻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更降低了普通居民对于乌克兰宪政民主制度的信任。政治腐败会削弱政府的行政体系，降低行政能力，并损害国家、公众的利益，败坏政府形象，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成为诱发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经济转轨和政治发展，政府往往会选择扩展权威，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以开辟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但这样容易导致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从而为政治腐败陡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其次，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摸索和适应的过程中，需要把外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本土文化和传统加以结合。处于社会转轨中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不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就很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³。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纯粹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是人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它只涉及政治社会成员

¹ 周晓鹏：《乌克兰橙色危机：腐败问题背后的政治博弈》，载新华网 2005 年 9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09/content_3466917.htm.

² D. Kaufmann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 (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pubs/govmatters4.html) 2005.

³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 页。

对政治的取向因素¹。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政治文化可以是高度一致的，也可能是两极分化的，甚至是多级分化的。乌克兰社会目前就处在两极化的边缘，在国内政治体系的安排和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上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两极分化的政治社会中，大多数公民处于极端的两头。在这种文化中，政治领导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将招致相当部分公民的不快，整个社会往往处于不断的纷争之中，并且很可能走向政治上的分裂。处在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政治结构准则往往选择参与型的，而其政治文化却是地域型的。从地域型文化向参与型文化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打破地域体系，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形成建设性的利益集团。移植过来的民主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政党竞争制度、广泛的民众参与。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政党制度。由于目前的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处于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分裂里，身处不同亚文化社群中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处于分散和游离的状态之中，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人们习惯于处理垂直的或纵向的关系，而不善于处理独立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导致现代的社会政治组织难以形成。面对突如其来的以追求个人平等、自由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民主选举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在乌克兰 2004 年和 2010 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在完善民主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大同小异，争论和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问题，这使得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偏好更多地来源于历史文化认同，来源于对候选人是否是“自己人”的认定。各个政党、团体或个人在利益、权力的驱使下，必然展开对权力的争夺，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规范的约束，这使不少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不受约束，或约束很少。人们无所不为，政治斗争处于失控状态，未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从而容易达到尖锐的程度，引发街头政治、暴力冲突、流血斗争，使政权处于动荡之中。2007 年 4 月，当时的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之间围绕国家行政权力划分发生纠纷。尤先科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解散，导致乌克兰政治陷入僵局。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不断升级，在总统和总理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的上万名支持者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集会和抗议。相持不下的局势使乌克兰几乎处在暴力冲突的边缘。

围绕是否应该加入北约问题，乌克兰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以尤先科为首的政治力量积极主张加入北约，拒绝让俄罗斯继续租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黑海舰队基地。而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政治力量则不赞同加入北约，并且不反对俄罗斯继续租用乌克兰的港口作为其黑海舰队的基地。两派政治力量围绕是否加入北约和黑海舰队基地问题的争论直接导致激烈的街头斗争。2006 年 5 月，尤先科执政时期的乌克兰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允许参加北约“海上微风 2006”联合军演的美军船只和军事专家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遭到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当地居民不仅连续数日封锁港口，阻止美军船只卸运军用物资，还在美军专家下榻的乌国防部疗养院门口举行示威活动，阻止其前往演习地点。两周后，美军只得在抗议声中撤离克里米亚，军演亦被迫取消。2010 年 4 月，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俄乌两国迅速达成的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留期协议，同样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强烈反应：数千名反对该协议的示威者集会抗议，反对派抨击亚努科维奇“出卖国家主权”，违背宪法，甚至扬言弹劾总统。如此的事例在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短暂历史中数不胜数，可见如不能在乌克兰形成和培养起同一的政治文化，将十分不利于实现民主认同的建立和国家政治稳定。由于不能克服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的政治准则被地区利益和族群利益绑架，因此导致在现代国家重建过程中，乌克兰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就演变为族际认同和区域认同问题。

乌克兰在民主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具体表现在新生的民主制

¹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版，第 95 页。

度固化过程中的困难。政府更迭频繁、腐败、寡头干政和街头斗争不断困扰着乌克兰社会。各种政治派别围绕政治改革、权力分配、组阁、选举问题的争斗经常陷入僵局，进而演化成为街头斗争和革命，这种民主国家构建的危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独立以来政局动荡。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族和地区之间矛盾升级，进而导致从民主政治问题蔓延到社会民族之间在历史、现实问题上争论，民主认同危机也就演化为民族认同危机。

结 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里，多数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都选择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也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越来越依赖于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在实现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为我们提出了下列思考。

1. 乌克兰某些政治家的过激言行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表面化。

其实，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 300 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民族关系，两个民族之间有着难以割舍血缘的关系。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1989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俄罗斯生活着 436 万的乌克兰族人，占俄罗斯总人口比例的 3%。据俄罗斯学者不完全统计，大约有 2000 万俄罗斯人拥有乌克兰血统¹。据俄罗斯 2002 年的官方统计，有 23 万合法的乌克兰劳动移民在俄罗斯从事短期或者长期工作。同期，在乌克兰生活的俄罗斯族人也达到了其总人口的 17%²，在乌克兰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到乌克兰总人口的 29.3%³。在这样两个民族融合如此高的国家间并不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和仇恨。然而，在历次乌克兰选举中出现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议题却被乌克兰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政治化，试图借助这些问题作为动员选民的工具。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政治家所创造的强迫人们进行两难选择的气氛，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可能选择多样化和完整的认同。政治领导人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乌克兰社会两极化和冲突性的政治认同，可见政治家的品质在国家认同的培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2. 民族认同危机增加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讨论民主化问题不能回避国家性问题，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参与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身份界定的可能性。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不解决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就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这些论断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成立的。民族国家认同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认同是新兴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基础性因素。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源于其族群认同，而族群认同源于其基本的文化特质。这里不仅包括源自父母基因上的生物遗传，也就是个人生理上的特征（如肤色、脸部轮廓等），还包括经由所属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社会性的特征（例如语言、宗教、历史及起源），这些基本的文化特质构成了身份与认同的基础。因为人类属于固定的族群共同体，因为遗传进化和血缘关系，族群总的来说是一种优先的、既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约束。族群联系具有逻辑和时间上的优先权，具有强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约束压倒其他的忠诚，也就增加了民主国家构建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社会转型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较容易催化其内部族群的分离倾向，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以往有所增加。虽然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已经从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巩固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民主巩固问题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认同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国家认同问题确实是影响民主巩固的基础条件。

¹ Городяненко В. Г. Проблемы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7. № 2. С. 15~20. <http://www.ecsocman.edu.ru/socis/msg/310848.html>

² 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委员会。 http://www.ukrcensus.gov.ua/eng/results/nationality-population/nationality_6/n56?data1=1&box=5.6W&out_type=&id=&dat=1&rz=1_1&k_t=00&id=&botton=cens_db2

³ 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委员会。 <http://www.ukrcensus.gov.ua/eng/results/general/language/>

处理好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将是乌克兰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比较政治的发展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家认同。在存在国家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民主”甚至会变成煽动族群冲突乃至国家分裂的工具。只有当“我应该属于谁”这样的国家认同解决以后，民主选举才不至于演变成为内乱。

【论 文】

历史与认同碎片化：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¹

刘显忠²

摘要：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只有 30 年。当今的乌克兰地区曾因地缘政治变化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极为矛盾的政治整合进程。实际上，当今的乌克兰历史是彼此很少联系的一些地方历史的总和。复杂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特点，而其民族、文化、语言特点的复杂性又导致了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深度困境。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深度困境及复杂成因，对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现实镜鉴：坚持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移植既有模式；坚持统筹兼顾，采取“多样一体”思路；坚持稳妥有序，实施科学合理的国家语言政策。多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国家建设，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朝着塑造共同历史与整体认同的方向深入。

关键词：国家建设；国家认同；乌克兰；俄罗斯；政治整合；民族问题；语言政策

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现在乌克兰的面积为 603,700 平方公里，如果把俄罗斯也视作欧洲国家，那么乌克兰的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的人口按 2013 年的统计是 4,500 多万。乌克兰是苏联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其境内曾集中了苏联较强的工艺和科技含量大的生产部门，素有“欧洲粮仓”之称。乌克兰从苏联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演变到今天，除了受到苏联解体造成的原有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和大国博弈的影响外，也与乌克兰自身现代国家建设效能较低有关。

学界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研究主要从国际政治方向展开。不少研究分析了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国际政治因素。比如，有研究指出，乌克兰危机既是一场在国际权力转移敏感时期发生的多方力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冲突，同时还是 21 世纪以来牵动全球秩序重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重大事件^[1]。还有研究指出，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乌克兰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围绕乌克兰争夺战而展开的一场战略博弈^[2]。少部分研究关注了乌克兰的内部治理状况。比如，有研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思潮是乌克兰内外交困的两大主因^[3]。还有研究认为，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4]。

相关研究为理解乌克兰问题提供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视角。笔者认为，乌克兰问题还应从历史视角加强梳理，分析复杂历史因素对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的深刻影响，探讨其对多民族国家有效推进国家建设的现实镜鉴。

¹ 本文刊载于《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147-157 页。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一、地缘政治复杂演进：乌克兰国家建设低效的历史因素

当今的乌克兰地区因地缘政治变化而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极为矛盾的政治整合进程。实际上，当今的乌克兰是历史彼此很少联系的一些地方历史的总和，是受不同民族影响的接合部和交汇点地区的历史。有学者指出：“现今乌克兰的版图是东西边界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东西边界在不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带有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特点的西乌克兰、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三个地缘政治板块。西乌克兰在西欧地缘政治空间存在的历史期限共 700 年，东、南乌克兰在俄国地缘政治空间存在的历史期限是 300 年和 200 年。黑海沿岸地区在地中海空间存在了 2000 多年。丧失一个外部方面就会导致国家多维联系空间的破坏。乌克兰是个交界处的国家，这不仅在其国名上有反映，而且也反映在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地位上，反映在西欧、斯拉夫和伊斯兰文明的超级民族交界线上。”^[5]乌克兰地区历史演进的复杂性滋生了历史和认同碎片化趋向。

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源头。“基辅罗斯”是 19 世纪学者们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表示 9 到 13 世纪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实体。12 世纪基辅大公名存实亡，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的时代终结，基辅罗斯分裂成许多公国。基辅罗斯的崩溃和蒙古人的到来，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也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乌克兰及俄罗斯都脱胎于基辅罗斯，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罗斯。当今的俄罗斯是以莫斯科为中心在东北罗斯发展起来的，而乌克兰民族的发源地则是从基辅罗斯分裂出来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

蒙古人到来后，弗拉基米尔的王公和加利西亚的王公都服从于蒙古的统治。在 14 世纪 40 年代，随着蒙古的衰落及其家族血脉的断绝，加利西亚-沃伦成了波兰和立陶宛争夺的对象。14 世纪立陶宛获得了大部分基辅罗斯的土地，基辅城在 1363 年归入立陶宛统治。波兰于 1349 年占领加利西亚和利沃夫。立陶宛大公国不仅成了基辅罗斯的强大继承者，也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的统治者。1569 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通过卢布林联合建立波兰-立陶宛联邦。立陶宛正式把基辅地区、切尔尼戈夫地区、波多利耶及其他地区划归波兰。乌克兰地区处于立陶宛统治时，立陶宛被罗斯同化，教会斯拉夫语甚至成了立陶宛大公国官方通用语言。乌克兰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后，罗斯文化再也无法与拉丁化影响和波兰语相抗衡。

1648 年，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反波兰起义对乌克兰的疆域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哥萨克酋长国由于没有能力与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对抗，转而寻求盟友。因为拥有共同的信仰，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于 1654 年签订《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哥萨克酋长国并入沙皇俄国，此后 300 多年乌克兰的文化逐渐和俄罗斯统一。自《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签订，俄国与乌克兰开始了纠缠不清的关系。为落实《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俄波斗争又持续了 13 年。在俄波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不断变换阵营，每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根据 1667 年俄波签订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只有第聂伯河左岸原基辅省的部分及第聂伯河右岸基辅周围不大的一块地方转归莫斯科；赫梅利尼茨基“国家”的所有其余的右岸部分，近一百年间仍处于波兰的控制之下。

当时，争夺乌克兰的不只是俄国和波兰，还有土耳其。1672 年 10 月，波兰国王在不能对土耳其入侵进行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布恰奇和约》。该条约把右岸乌克兰分成了三个部分：波多利耶（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由土耳其占有；布拉茨拉夫地区（现在的文尼察州的一部分和赫梅利尼茨基州的一部分）和基辅南部地区由土耳其的附庸右岸哥萨克盖特曼多罗申科掌控；右岸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归波兰。

1686 年 5 月 6 日，为了共同抗击土耳其，俄波两国缔结《永久和约》，不只是东部乌克兰，原先规定退还给波兰的基辅及其毗邻地区也永久归属俄国。波兰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俄国结束同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和平关系。1699 年 1 月 29 日，反土同盟与土耳其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维茨

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在该和约框架下，波兰收回了《布恰奇和约》中丧失的土地，其中包括波多利耶和右岸乌克兰的其他部分。

18世纪末，由于内部的政治经济深刻危机和外部新强邻出现，曾为中欧大国的波兰从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了。波兰的消失影响到西乌克兰的命运。1772年，俄普奥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使乌克兰的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包括利沃夫和波多利耶、沃伦的一部分并入奥地利。1792年，俄普两国对波兰进行瓜分，俄国得到了德鲁亚-平斯克-兹布鲁齐一线以东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即明斯克省、维尔诺省、基辅省、布拉茨拉夫省、波多利耶省、沃伦省的东部和立托夫斯克-布列斯特省的一部分。1795年，俄普奥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俄国获得了沃伦的西部。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和1686年的俄波《永久和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东乌克兰、基辅市及其毗邻地区、扎波罗热地区归属俄国。而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使右岸乌克兰分属两个国家，大部分地区归属俄国，一小部分地区归属奥地利。

不过，当时各方争夺的乌克兰地区并不包括斯洛博达乌克兰、新俄罗斯地区及后来的克里米亚。《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和后来的俄乌条约都不涉及这些地区。斯洛博达乌克兰是乌克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当今乌克兰版图上的哈尔科夫州、苏梅州、顿涅茨克州的一部分（到巴赫穆特卡河）和卢甘斯克州的一部分（到艾达尔河）。斯洛博达乌克兰从17世纪开始就受俄国直接管辖。早在17世纪中期，这里就建起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团、阿赫特尔卡团、苏梅团和哈尔科夫团，后来又建起了伊久姆团。这些军团构成别尔哥罗德防线，从南部保卫俄罗斯甚至波兰免遭克里米亚汗国军队的袭击。在沙皇俄国进行省制改革时期，1764年在斯洛博达乌克兰地区设立了斯洛博达乌克兰省。19世纪中叶，在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时，哈尔科夫省成为单独的地区。然而，所有这些地区都是按南俄地区的逻辑发展。新俄罗斯地区在历史上是俄罗斯帝国扩张的结果。它主要指并入俄国的黑海北岸地区，这些地区在并入俄国前大部分实际上是无人居住的草原。克里米亚汗国的部队和土耳其苏丹的军队经过这里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进行经常性的袭击。在几次战争之后，这些地区根据1739年、1774年、1791年和1812年与土耳其签订的和约归入俄国。这些地区并入俄国后，新俄罗斯当局开始向新俄罗斯移民，移民来源主要是乌克兰族人及俄罗斯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德意志人。克里米亚在1954年才划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战中俄国的失败及十月革命的发生，为乌克兰提供了在废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但由于传统的地区均势被打破，乌克兰地区成了各种势力的角逐场所。这个区域里既有乌克兰自身争取独立的行动，也有波兰、德国在该地区的争夺。相关国家都从各自的利益来考虑乌克兰问题。在1917至1920年这个时期，乌克兰境内总共成立了大约十几个不同的共和国：除了数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还宣布成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敖德萨苏维埃共和国、塔夫利达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克里米亚边疆区政府、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说明，一战后乌克兰的不同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存在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态度，但都希望在新的实体包括的区域范围内独立。可以说，1917至1920年期间的乌克兰区域是各种不同实体的“大杂烩”，各个实体往往是一些想要掌握政权并宣布自己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冒险家活动的结果。各方斗争、妥协的结果是，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一战后乌克兰地区分属于四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的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1939至1945年间，苏联通过各种途径把境内45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地区与分散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不到15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区域合到了一起。这时，多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第一次统一在了一个国家组织境内。虽然从联合国诞生之日起乌克兰就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但是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却在1991年独立之后。

二、政治整合难以推进：乌克兰国家建设低效的结构因素

复杂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特点及其内部关系。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对这些复杂的内部关系实现政治整合，建设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关系。然而，复杂的历史因素极大制约了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进程。

就乌克兰的民族构成状况看，乌克兰是多民族国家，有 110 多个民族。其主体民族是乌克兰族，占总人口的 77%；俄罗斯族是第二大民族，占总人口的 17%。其他民族如白俄罗斯族、犹太族、鞑靼族、摩尔多瓦族、波兰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德意志族、保加利亚族等共占 6%。

从民族文化角度看，乌克兰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人数大致相当的国家公民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在乌克兰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母语为乌克兰语的乌克兰族人。实际上，西乌克兰的所有居民以及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大多数农业居民都属于这一群体。第二个群体是从童年就说俄语、接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的乌克兰族人。这部分人群主要居住在第聂伯河沿岸的城市，以及斯洛博达乌克兰和波列西耶的村镇。第三个群体是以俄语为母语，世界观受到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俄罗斯族人^[6]。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乌克兰人口中约 23% 是俄罗斯族人，但 36% 的人是说俄语者。换句话说，占人口比例 73% 的乌克兰族人中，只有 64% 的人说乌克兰语。在国家层面，这同以家庭为单位的比例是大致平衡的：36% 是说乌克兰语的家庭，33% 是说俄语的家庭，不到 30% 是双语家庭。语言使用的地区分布也很复杂。在西乌克兰，只有 3% 的人是说俄语者；在乌克兰的中部地区，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16%；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说俄语者占多数，分别占 55% 和 56%^[7]。

不过，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尽管说俄语人口的比例较大，但只有在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的比例才占绝对多数。克里米亚的民族超过 125 个，有 80 多个民族群体，其中俄罗斯族人占 58.5%，乌克兰族人占 24.4%，克里米亚鞑靼族人占 12.1%。而在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区，尽管说俄语的居民占优势，但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并不大。根据 2001 年的人口普查，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的俄罗斯族人占 39%，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的俄罗斯族人占 25.6%。

就乌克兰的宗教状况看，乌克兰 88% 以上的居民信基督教，且大部分又是基督教的东正教信徒。但是，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是不统一的，分为三支。根据 2010 年的统计，2009 年乌克兰的东正教分支中，教区数量最多的是与莫斯科大牧首保持教规联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有 11 790 个教区）。就宗教团体数量而言，在乌克兰国内居第二位的是基辅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有 4 251 个团体）。第三支是在教会法规上不被承认的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有 1 197 个团体）。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莫斯科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团体占绝对优势。在这个地区，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大牧首）成了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实际纽带，尤其是在语言问题上。基辅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在西部三个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占主导地位；而在罗夫诺州、沃伦州和基辅州，大约有 20% 宗教团体属于基辅大牧首^[5] 131-132。

除了东正教外，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西部地区民众有巨大影响。根据 2009 年的官方资料，“93.3% 的希腊天主教团体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利沃夫州数量最多（1 496），捷尔诺波尔州（+769）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650）。如果说 1992 年初教会在国家的一半的州和基辅市都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如今（2009 年——引者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团体在乌克兰各个地区都有活动”^[5] 131-132。

除了上述主要宗教派别外，乌克兰还有其他宗教信仰。在西乌克兰有不少天主教会，在东乌克兰有不少新教团体，主要是传统的新教（浸礼宗、路德派、福音教派、耶和華见证人等）。乌克兰也存在一些信仰犹太教的团体（在南部较多）和信仰伊斯兰教（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其他

宗教的情况。罗马教廷支持天主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而土耳其的穆斯林会支持克里米亚的穆斯林。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材料，独立后乌克兰宗教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新教大规模传播。新教在乌克兰总共有 9 500 个宗教组织，占整个宗教网的 27.2%。根据乌克兰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评估，与传统的教会相比，新教和新宗教组织的数量在加速发展^[5] 131-132。

就乌克兰的地区关系看，当今乌克兰的政治区域划分可从两个层面、三大区域进行。第一个层面表现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第二个层面表现为自己“群体”内部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区域次共同体。当今乌克兰地区可以划出三个大区域带——西部、中部和东南部，与外喀尔巴阡-加利西亚-沃伦地区（当今的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沃伦和罗夫诺州）、小俄罗斯-右岸地区——传统的“乌克兰”（日托米尔、基辅、切尔卡瑟、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苏梅、基洛沃格勒和文尼察州）及新俄罗斯（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各州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轮廓基本一致^[5] 176-177。

19 世纪中叶前没有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从 18 世纪末就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曾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一部分的乌克兰地区，应当视作西部大区的核心。西沃伦尽管因第三次瓜分波兰而被并入俄国，但受到了加利西亚的强大影响，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也归入西部大区。波多利耶（赫梅尔尼茨基州）在与奥斯曼土耳其斗争中曾是主要的“波兰堡垒”。这些地区形成了有别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政治上积极的精英的意识形态。而中部是以基辅为中心的第聂伯河左右岸地区，是博·赫梅利尼茨基的“自治国家”所处的地区。这是乌克兰的核心地区，即传统乌克兰的母体。东南部的历史命运以及区域开发特点与前两个地区不同。其结果就是形成人口的独特构成和文化。这是最晚开发的地区，在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发生过高强度的殖民化和发展进程。这个地区与波兰遗产关联不大，与俄罗斯特别是苏联的遗产关联最大。这是乌克兰工业最发达和最城市化的大区。除基辅外，所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敖德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哈尔科夫）都集中在这里。在新俄罗斯，居民本身所固有的乌克兰认同要比中部乌克兰地区的居民少得多。绝大多数新俄罗斯人不认为“俄罗斯自我意识”和“乌克兰自我意识”之间及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化政策，如果对共和国中部地区来说是对自己文化的某种回归，那么对苏维埃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而言则是外部文化的介入。

这三个地带的社会经济面貌也不相同。东南区是工业（农业-工业）大区。除了基辅之外的中部和西部是工业-农业区，农业生产的作用很大，而工业生产的作用比较低。在东南部各个地区的城市人口都绝对优于农业人口；中部乌克兰的情况朝着有利于农业人口的方向变化。而在西部的大区，8 个州中的 5 个州的农业人口优于城市人口，只有沃伦、利沃夫和赫梅利尼茨基三个州，农业人口不占多数。乌克兰所有的大城市中心都分布在东南。

这三个大区域带内还可以分出次区域共同体。这三个地带中至少有两个可以划分一些“小地区”，它们有更为鲜明的特色，经常发挥作为自己地带文化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比如，西部有地方性政治运动的基地——外喀尔巴阡、加利西亚，东部有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是乌克兰文化政治地带的第二个层面。如果说加利西亚是西部地带的文化核心，那么外喀尔巴阡则是一个独特的独特边疆区，不觊觎中心地位，确切地说类似于克里米亚。而在这方面，顿巴斯就完全可以被视为加利西亚的政治反极，它力求对东南各个地区起到整合作用。

三、国家认同冲突断裂：乌克兰国家建设低效的重大后果

在历史上，乌克兰的各个部分曾长期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各个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特点，各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差别很大。这导致了乌克兰各个地区民族文化构成极为复杂，缺少民族文化

上的国家认同。由于国家层次认同的断裂和缺失，当今乌克兰在现代国家建设中面临深度困境。其一，复杂外部环境对国家认同建设不利。历史学家浦洛基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处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成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8] 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导致欧亚的中心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地缘政治“黑洞”。

美国、欧盟和俄罗斯都把乌克兰视为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对美国 and 欧盟而言，他们认为控制乌克兰就可以遏制俄罗斯的发展。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斯蒂芬·皮弗曾明确提出：“华盛顿不应当也不能够放任乌克兰进入莫斯科的地缘政治轨道。”^{[5]109} 对俄罗斯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源头，是它们的文化摇篮。同时，乌克兰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最后一道屏障，事关俄罗斯自身安全、民族利益和经济发展。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发展也积极干预，以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前10年快结束时，俄罗斯提出了“俄语世界”的构想。“俄语世界”包括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得以传播的那些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概念，“俄语世界”是针对“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提出的。“俄语世界”的地理边界除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斯拉夫国家外，还包括另外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立教会的国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以及一些说俄语的伊斯兰国家，其中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7]232}。“俄语世界”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形成了重大外部影响。

除了美国和欧盟，各个相邻国家都有向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的政治人物或反对派活动。斯洛伐克存在对乌克兰领土觊觎的拥护者。匈牙利给居住在外喀尔巴阡的所有匈牙利人发放绿卡。此外，“大罗马尼亚”拥护者也支持对北布科维纳的领土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已经开始给父母在1940年6月28日前是罗马尼亚公民的切尔诺夫策州居民发放护照。

其二，乌克兰国家建设依赖外力模式对国家认同建设不利。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复杂，具有独立主权的乌克兰是苏联国内政治形势演化的结果，不是乌克兰全民族经过艰难的统一斗争获得的。因此，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全民族思想并没有形成。正如有关研究指出的：“作为时代的反映、作为普通人都能接受的思考方法的乌克兰民族文化至今还没有形成。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捷克那样，既没有出现自己的哈谢克，也没有出现自己的恰佩克”^{[6]169}；“它作为国家、甚至作为一个民族目前还没有形成。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乌克兰都没有独立生存的经验”^{[6]142}。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居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有统一文化和民族价值的统一民族，由于各个地区的巨大差别，“有相当多的东西可以使乌克兰的各个区域分离”^[9]。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是真正的内部文化-语言统一的共同体。独立后，乌克兰也没有真正形成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只是形成以国界为单位“拼装”起来的人们的共同体。乌克兰的地区精英没有提出不同地区在统一国家框架内相互共处的主张，没有提出能够令多数居民感兴趣的观点。不同的政治力量在过去和现在都为构建他们所想象的“自己”的“国家”而争斗。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开始大批地到西欧国家工作生活，所以那里的居民拥护乌克兰向欧洲发展。乌克兰的中部和东部在同一信仰者的友好环境中发展。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哈尔科夫在很大程度上以俄罗斯为发展取向。

独立后的乌克兰没有提出令国家各个主要居民群体都满意的全民族思想，区域差别也没有被克服，关于“建一个什么样的乌克兰”的争论一直持续。“欧洲选择”和“欧亚选择”的拥护者互不相让，结果是使国家进一步撕裂，丧失更多的独立性。正如一位学者评价的：“经常丧失自己独立性的乌克兰人不要抱怨某人的诡计，只能怨自己。不愿意彼此达成协议以及习惯性求助外国仲裁法官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给人的印象是乌克兰获得独立后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一些

政治家声称‘欧洲选择’的必要性，另一些人谈‘欧亚选择’的必要性。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案——这是缩小独立性和丧失主权之路，尽管是部分丧失。”^{[5] 225}

其三，复杂的语言文化状况对国家认同建设不利。困扰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因素还有语言文化问题。乌克兰除了加利西亚、外喀尔巴阡地区和北布科维纳外，其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与俄罗斯存在着某种历史联系。独立后，由于乌克兰政治精英在处理语言文化问题上的极端认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被简单化视为乌克兰的“包袱”。乌克兰政治精英当中有这样一种认识占主导地位，即乌克兰只有当社会上达到了某种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乌克兰政治精英甚至形成了一种共识：乌克兰不是两个或多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建立在乌克兰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早在1989年，乌克兰语就被宣布为唯一的国语，要求只能用乌克兰语处理公文，高校绝大多数专业都用乌克兰语教学，逐渐减少俄语学校和幼儿园的数量等。他们建立新的乌克兰政治认同更加经常使用“对立的方式”——以乌克兰自我意识对抗俄罗斯自我意识。他们把乌克兰俄语、俄罗斯文化及俄罗斯看成对年轻的乌克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最重要威胁”。如何对待乌克兰的俄语及俄语居民问题，也就成了乌克兰政治精英不可回避的问题。库奇马竞选总统时的主要口号是宣布俄语为第二国语，但在他当选后没有兑现承诺。

苏联解体后头十年，乌克兰的“去俄化”尽管逐渐加速，但并不激烈和急剧。尤先科掌权后形势发生了改变。2004年“橙色革命”后，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反对俄罗斯文化和乌克兰文化共存，乌克兰当局加大了乌克兰化的力度。2005年春，乌克兰当局出台法令，要求各个司法和权利保护机关的活动只能用乌克兰语开展，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居民聚居地区。俄语学校的毕业生被禁止用俄语参加高校的入学考试。亚努科维奇2010年就任乌克兰总统后，试图解决乌克兰的俄语地位问题。2012年7月3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8月8日亚努科维奇签署了该法律，8月10日生效。该法得到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使俄语在乌克兰27个州中的13个州成为地区官方语言。但是，这引发了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抗议。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最高拉达废除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取消了俄语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这一举措根本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语言问题也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及顿巴斯地区大规模冲突的重要原因。

此后，乌克兰当局继续压缩俄语的影响。2019年4月，波罗申科在自己掌权的最后阶段通过了《关于保证乌克兰语作为国语作用》的法律。就实质而言，该法中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被最大限度地压缩。根据该法，只有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国语和官方语言。该法规定，无视这一法律等同于亵渎国家象征：对语言的不恭敬要被处以罚金；乌克兰中央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人民代表、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医务工作者、教师无一例外都要掌握乌克兰语；各种会议、活动、权力机关的工作交往、在举办各种国家及市政活动期间，都要用乌克兰语进行；在国立幼儿园、中学和高校只能用乌克兰语授课。

从2020年9月1日起，乌克兰的所有俄语学校都改用乌克兰语教学。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只有小学五年级之前在教乌克兰语的同时允许教母语，而在中学要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学习乌克兰语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涉及不在自己的语言环境中居住、也没有国家归属的乌克兰原住民族。对他们而言，除了合理地学习乌克兰语外，从1年级到11年级（12年级）都用他们的语言教学。第二种方法涉及用属于欧盟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根据语族和语言环境，这种模式的使用可能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小学孩子们在学习国语的同时，用母语学习；从5年级开始，要求每年不少于20%的课程应当转用乌克兰语授课，而到9年级时该比重应当不少于40%；在高中学校的课程至少有60%要用国语进行教学。第三种方法最具歧视性，涉及乌克兰的其他民族群体，主要是俄语群体。这个群体被要求在小学用他们的语言授课，同时要学习乌克兰语，而从5年级开始不少于80%的课程要用国语授课。

此外，乌克兰当局也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场景推行这种语言政策。乌克兰当局要求，在剧院和

电影院应当是乌克兰语居主导地位，外文的戏剧和电影应当伴有乌克兰语译文。社会活动（圆桌会议、会议等）被要求用乌克兰语或英语举行。大众媒体则被要求彻底改用乌克兰语：电视节目应当是乌克兰语占主导；规定外语电视广播节目和广播的总时长，对全国广播电台而言不能超过一昼夜广播时间的 10%，对地区和地方广播电台而言不能超过一昼夜广播时间的 20%。乌克兰法律还支持在商业、公用事业、医疗和医药领域使用乌克兰语。比如，要求所有的商店、饭店、理发店等机构都应当用国语提供服务，要求在医疗活动中接待患者和开具各种凭证都只能用乌克兰语。

乌克兰政府为了执行这种语言政策还专门设置了有关机构。乌克兰设置了一种职务——语言巡视官，负责“监督保护国语的语言法要求的执行”。乌克兰对违反语言使用法律所规定的罚金数额相当大。比如，在公文处理和执法机构罚金的额度为 3 400~6 800 格里夫纳；在文化、教育和招贴广告领域罚金是 3400~5100 格里夫纳；对出版媒体的罚金额度为 6800~8500 格里夫纳。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俄语的国语地位，是对俄语及俄罗斯文化强大影响存有担忧，认为俄语是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威胁”。曾任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利特温认为：“如果乌克兰再把俄语作为一种国语，那么乌克兰语就会丧失，而国家也会与它一起丧失。”“鲁赫”党的最高拉达代表帕夫洛·莫夫昌在接受“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时也表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比导弹还强大。乌克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俄罗斯人不战而胜。如今根本没有办法让乌克兰语真正像宪法所规定的那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语。”^{[6] 105}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很难说是出于对俄罗斯人的“天然仇恨”，实质上是对俄罗斯族居民和俄罗斯文化作为全盘乌克兰化道路上最大障碍的一种反应。

简单化排斥俄语、强行乌克兰化，既伤害了作为原住民的俄罗斯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感情，加剧社会的分裂，也没有法理上的根据。乌克兰早在 1999 年就加入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该宪章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是欧洲文化遗产最宝贵的要素之一，在私人及社会生活中使用地区语言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人权。这一原则已经在宪章的序文中列出，也与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有关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主要文件规定的原则完全一致。2006 年 1 月 1 日，该宪章在乌克兰生效。根据该宪章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占该地区居民总人数 20% 或以上的行政区域单位，该少数民族的语言在该地区应当与国语处于同等地位。因此，乌克兰东部及南部俄语居民占多数的地区把俄语作为地区官方语言的要求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如乌克兰历史学家托洛奇科所说：“我们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乌克兰。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西部乌克兰、东正教的东中部乌克兰、穆斯林的乌克兰（尽管它不大，但也存在）以及由人为并入乌克兰的地区组成的俄罗斯乌克兰（顿巴斯、克里米亚、新俄罗斯）。……这些人不是生活在我们的领土上，而是生活在成了乌克兰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就是其自己的土地上。所以，要寻找共同语言，克服上述分裂线。……要赋予这些人愿意说的语言以地区语言地位。”^{[5] 225-226}

乌克兰当局推行的语言政策不仅无助于国内团结，反而加大了社会裂痕。乌克兰的一些政治人物千方百计地强调“乌克兰不是俄罗斯”。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强调“乌克兰不是俄罗斯”时，并没有把发展乌克兰文化作为自己的优先任务，而是把排挤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脱离关系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思路既不利于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发展，还会引起很多新矛盾。乌克兰与俄罗斯曾在共同历史下相处了 300 多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乌克兰长期以来主要是通过俄语了解世界文化的，乌克兰的文化也是通过俄语传播的。实际上，俄罗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乌克兰文化的一部分，“如拒绝这份遗产，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文化就像荒漠一样”^{[6] 112}。另一位学者也曾指出：“否定俄语和文化会使乌克兰文化本身变得更贫困，使其丧失不可能完全为仓促编造的神话所取代的真正的历史根源。”

四、塑造共同历史与国家认同：乌克兰国家建设的现实镜鉴

乌克兰是地缘政治合力形成的国家。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状况，给乌克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乌克兰在推进国家建设中本应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多民族构成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保持清醒认识。但是，乌克兰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由于存在不合理的安排，不仅不利于国家统一，反而加剧了矛盾，为外部势力利用。比如，2021年7月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泽连斯基提交的《乌克兰原住民权利法案》。该法案生效后，世代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占该国人口比例的18%）、白俄罗斯族、德意志族、匈牙利族、波兰族、罗马尼亚族等少数民族不再属于乌克兰的原住民，不再享有与乌克兰族同等的权利，恶化了民族关系。乌克兰独立后国家建设实践的教训，对多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共同历史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镜鉴。

首先，坚持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移植既有模式。在历史文化和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设，一定要对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民族构成有清醒的认识，提出能够为全国接受的统一的政治整合方案。这样才能使各方形成共识，形成一体的国家认同。公共政策制定不能从既有的观念和模式出发，一定要考虑本国的具体实际，从而制定出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案。

其次，坚持统筹兼顾，采取“多样一体”思路。多民族国家内含民族、文化、宗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广泛多样性，国家建设既要尊重多样性，也要加强共同性建设，科学把握多样性和共同性的辩证关系。就乌克兰而言，辩证处理多样性和共同性原则，要实行平衡的地区政策，把同时满足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作为突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消除乌克兰内部的裂痕，促进“政治民族”的真正形成，形成全国民众都接受的统一的国家认同。

再次，坚持积极稳妥、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语言事关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稳妥有序地施行语言政策方能取得正面效果。乌克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简单化思路，使国家语言建设背离初衷。偏激且不符合实际的语言政策与社会政治纠葛，是造成乌克兰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给国家统一和安全带来危害^[10]。就乌克兰而言，要既支持乌克兰语，也支持俄语，而不应当人为制造两者的冲突。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我国独特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政策和制度体系，实现了国家团结统一、和谐稳定和高效发展。在新时代，我国深化现代国家建设，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国家建设的独立自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处理国家内部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上，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做到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我国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在语言文化政策上，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

参考文献：

- [1]冯绍雷，“国际秩序转型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基于演进过程、深层结构、解决方案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2）：84-98。
- [2]黄登学、刘佩鹏，“新一轮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大国战略博弈及前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4）：139-153。
- [3]于洪君，“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思潮是乌克兰内外交困的两大主因”，《人民论坛·学术前

沿》2021（16）：98-105.

[4]张弘，“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乌克兰政治转型三十年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6）：42-58+153.

[5] Григорьянц В.Е., Жильцов С.С., Ишин А.В., Мальгин А.В. Федерал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ы: к единству через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M]. М.: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11: 106.

[5] Медведев Р.А.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M]. М.: Ин-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 (ИНЭ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акад.исслед. будущего (МАИБ), 2007: 14-15.

[7] 德米特里·特列宁，《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251.

[8] 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曾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490.

[9] 列昂尼德·库奇马，《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路晓军，远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00.

[10] 李发元，“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9）：56-62.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42 期

移民日本：一个民族主义社会中的流动性和归属

格里西亚·刘-法勒（Gracia Liu-Farrer）著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0 年



书籍简介：《移民日本》一书中用社会学、地理学和心理学理论来解读日本移民的生活故事，揭示了日本本土的意识形态对于外来移民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法勒认为，日本既是一个“移民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社会，“种族纯洁性和文化同质性”是其话语的核心。这意味着，无论一个人的日语水平或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了解程度如何，日本总有一些除了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以外无法完全了解的“秘密元素”。

这样的民族主义社会如何能够同时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呢？作者在书中解决了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并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了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所涉及的策略和情感。

作者简介：格里西亚·刘-法勒(Gracia Liu-Farrer)是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所(GSAPS)社会学教授兼亚洲移民研究所所长，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移民、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全球化和国际教育。目前，她正在研究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对移民的职业生涯和工作价值的重构，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公司如何应对流动工人的增加。

书籍介绍：如果日本要改变目前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的发展现状，它必须认真考虑将外国移民工人作为其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书中所言，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中建立移民社会充满了挑战。

刘-法勒指出，自从战后经济繁荣期间首次大规模移民流入以来，合法移民到日本的途径多种多样。然而，日本政府处理这一话题时刻意犹豫态度（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否认日本是一个移民国家），且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为移民创造话语空间，这导致了日本移民问题的不确定性与实用主义倾向。即，如果负责日本的长期移民的官僚程序是冷漠、复杂的，并且缺乏一个被广泛推广的移民叙事和话语空间，那么，外国移民到日本的流动过程便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因为一切取决于眼前的生活环境和不可预见的个人命运。

刘-法勒的这部民族志作品《移民日本》涉及了广泛的议题，且其写作手法精湛。它基于作者在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地进行的长达二十年的实地研究。在这些年间，作者和她的研究助理访谈了 300 多名日本移民，本书以其中的 229 名被访人为基础。这批群体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移民路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性别、种族和民族身份。其中，不少被访者提供了长达十年的移民经历。除了大量的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作者还使用了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来说明移民居住在日本的现状。这包括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二手研究数据，还囊括了她作为日本公民、移民研究者和日本母亲三重身份之下的个人经历与反思。

《移民日本》的分析焦点围绕两个相互深刻关联的主题：移动性，即最初吸引外国移民群体来到这个国家的推拉因素，随后导致他们选择留下或离开的原因；归属感，即外国移民群体与日本社会的成员之间关系建立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创造出强烈的情感纽带，帮助移民在他们的采纳环境中扎根。

在第一章中，作者将日本视作一个“充满许多机会的地方”，以揭示促使人们决定移民日本的各种经济、社会、情感或法律动机。在此过程中，她巧妙地让人们注意到移民经历中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日本所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如严格的工作文化，既吸引又阻碍了人们移民日本。这一发现对当代日本的研究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挑战了将日本定义为“完美生活方式的目的地”等此类流行的比喻。

从第二章开始，作者转向探讨移民的法律渠道和签证类型，并讨论这些移民法律问题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他们在日本社会内的流动性。

第三章讨论了外国移民（以国际商业领导者、外语教师或餐厅老板为例）的创业和经济策略。本章谈到外国移民往往利用他们有竞争力的职业技能和跨文化知识而打拼事业。

第四章和第五章呈现了外国移民如何从移民到日本、安定扎根、再决定暂时或者永远离开等一系列流动状态的转变过程。

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区分了外国移民对“家”（home）和“归属感”（belonging）的不同理解。她利用各种社会和地理概念来说明构成移民在日本内外的归属感或家庭归属感的各种情感、社会和个人因素。作者利用她的“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y）概念来探索“多层和多维的归属感以及移民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不同情感”（第 128 页）。

第七章和第八章，作者重点讨论了移民儿童的教育流动性和基于身份需要的旅行（identity journeys）。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第八章，作者讨论了在缺乏多元文化教育机会的日本社会里，青少年群体面临的移民身份认同问题。

总体来说，《移民日本》为我们呈现了前新冠肺炎时期的日本移民图景。从 2020 年 3 月开始，日本政府禁止不同国籍的外国永久居民重新入境的这一严格限制措施遭到强烈谴责（Osumi 2020）。因此，许多永久居民和外资企业提出：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他们将搬离日本（Kopp 2020; Osumi 2020）。考虑到这些时期，一些人可能很难认同作者的主张，即“疫情大流行后的日本”将成为下一个全球移民的目的地（Liu-Farrer, 2020）。无论如何，作者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即如果日本领导人真的希望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他就需要鼓励就移民和日本社会多样性进行更开放的对话。

为了提高移民的认知度，同时加深对他们移民经历的理解，《移民日本》没有偏颇地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移民个体的叙述，他们寻求更多机会，并为在日本经营自己的生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书记录了全球疫情大流行导致的流动限制、失业和不确定性时期之前，日本的移民状况。研究后疫情时代日本移民的学者将受益于刘-法勒的研究，将其作为前疫情时代的参考。

《移民日本》一方面可成为研究日本长期移民的参考和起点，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理解传统意义上的非移民社会（韩国等国家）提供有益的思考线索。

本文采编整理自：

Gracia Liu-Farrer. 2020. *Immigrant Japan: Mobility and Belonging in an Ethno-nationalist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ilkinson Aoife. 2021. Review: Immigrant Japan: Mobility and Belonging in an Ethno-Nationalist Society. *New voices in Japanese studies*, Vol.13: 82-86.

Yunchen Tian. 2021. Book Review: Immigrant Japan: Mobility and Belonging in an Ethno-nationalist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56(1): 329-331.

Michael Strausz. 2021. Immigrant Japan: Mobility and Belonging in an Ethno-nationalist Society by Gracia Liu-Farrer (review). *Monumenta Nipponica*. Vol.76(2): 444-445.

延伸阅读：

Davidson, Joyce, Mick Smith, and Liz Bonfi. 2007. (eds). *Emotional Geographies*. Farnham: Ashgate. 情感地理学

Castles, Stephen, and Alastair Davidson. 2000.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公民与移民：全球化与归属政治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J. Miller. 2003. *The Age of Migra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移民时代

Ivory, T. 2023. *Bifurcated incorporation and migrant social mobility in Jap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61(4), 305-319. 分叉融入与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在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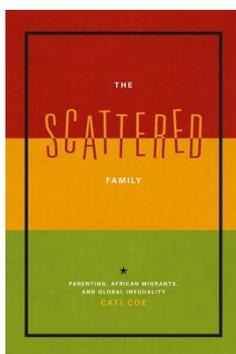
Chung, Erin Aeran. 2010.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日本社会的移民与公民问题

（编译：谢小雨，责编：邱昱，排版：胡琼）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43期

分散的家庭：子女养育，非洲移民与全球不平等

卡蒂·科伊（Cati Coe）著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年



书籍简介：如今，人们为寻找工作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迁徙，造成了家庭的分离这样一个广泛存在且令人不安的后果。在《分散的家庭》一书中，卡蒂·科伊对生活在加纳当

地及国外的加纳人中的家庭分离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挑战了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完全不受控制的力量这一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详细描述了加纳家庭是如何丰富多样且富有创造性地调整长期以来的家庭习俗，以适应当代全球化的形势。

通过民族志和档案研究，科伊发现了一套丰富而动态的家庭观念、习惯、关系和期望，她称之为“剧目（repertoire）”，这些都是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接触中逐渐形成的。

她指出，失散的移民家庭利用这些剧目来帮助自己解决移民政策、缺乏儿童照顾等一系列问题，并指导他们以自己认知范围内最好的方式来抚育子女和维持人际关系。通过研究当地与全球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科伊在该书的最后提倡要重新思考家庭本身的含义。

本书还获得了全球南方协会（Association of Global South Studies）Toyin Falola 非洲图书奖和非洲人类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Africanist Anthropology）Elliott P. Skinner 奖。

作者简介：卡蒂·科伊（Cati Coe）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二十年，后加入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担任政治学系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为跨国家庭、老龄化和看护等。除了《分散的家庭》以外，科伊还有多部获奖著作，例如《新美国奴役：非洲移民家庭护理工作者的政治归属》（*The New American Servitude: Political Belonging among African Immigrant Home Care Workers*, 2019）和《看护的变化：西非的老龄化、移民和社会阶层》（*Changes in Care: Aging, Migr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West Africa*, 2021）。

书籍介绍：《分散的家庭：子女养育、非洲移民与全球不平等》探讨了在美国的加纳劳工移民与他们在非洲的子女、亲属之间的亲属纽带，并挑战了西方对全球跨国家庭的传统理解。人类学家卡蒂·科伊（Cati Coe）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移民的“剧目（repertorie）”，即他们现存的家庭生活观念、实践和资源，并据此来调整适应迁移过程中的经历。她认为，“移民及其家庭的剧目影响着他们彼此分离的形式以及他们对这种分离的感受”（第5页）。

本书具体讨论了移民到美国的加纳人及其家庭如何调整他们的剧目，以适应父母的国际移民所造成的亲子分离。在科伊看来，“剧目”概念与布迪厄提出的“惯习（habitus）”一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她认为，剧目意味着文化资源和框架的多重性，它是实践、知识和观念的主体或集合以使人们能够想象可能性，期望某些事情，并重视某些目标（第15-16页）。

本书大概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本书的导言和前两章）阐述了全书的中心框架和论点。首先，作者详细介绍了加纳的历史、家庭互惠文化以及移民家庭的经济需求。为了经济上的存续，加纳家庭常常让其他家庭成员长期照看孩子，这种制度进而影响了如今的家庭关系。接下来，她详细阐述了剧目（repertoire）这一概念。这概念包括集体养育（distributed parenting），即由多人而不仅是父母来看护儿童；儿童看护是灵活且暂时的，且是根据看护者的能力和被看护者的需求来进行的。科伊进而将这一讨论与加纳乃至整个西非都广泛实践的寄养（fostering）联系起来。

寄养的概念对于理解加纳社会的家庭关系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儿童的流动性上。正如 Page 于 1989 年论述的那样，“寄养”观念植根于西非社会，这里社会再生产和父母的角色被细分，以便更多的亲属群体可承担起不同的角色。这种“寄养”概念挑战了西方的主流家庭观念，它也重新定义了何为“合适（proper）”母职，也促使我们思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母亲是否需要持续在场。科伊考察并质疑了“看护（care）”的传统理解，并呼吁将“看护”视为多维度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了移民前往美国和在美国生活的情况。第三章《国际移民和寄养》举例说明了分散在美国各地的跨国家庭和移民家庭的类型，并讨论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其中，该章节揭示了为何美国移民法看似支持家庭团聚，但实际上却导致家庭分离的悖论。科伊指出了一些阻碍家庭团聚的隐性和显性障碍，包括对谁构成“家庭”的定义、记录这些关系的过程，以及支付复杂冗长官僚程序的费用。本章还讨论了“移民全球化”（Castles 和 Miller, 2009 年）问题，即冷战后移民人数激增，但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地也呈现多样化。

第四章《美国的工作与儿童看护》讨论了加纳家庭中的母亲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并探讨了大多数在美国有年幼子女的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复杂权衡问题。该章也介绍了在美国的加纳女性为何不再看护寄养儿童的原因。这是因为她们中大多来自富裕家庭，或在来美国之前受过高等教育。在这一章中，科伊指出个人的工作与生活选择往往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力量制约。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跨越国界的生活。第五章《边境工作：一个有意识的曲目》发挥了该书多地点民族志的优势，比较了跨国家庭的教育体制和加纳本地的就学经历。在美国，来自加纳的学生往往被隔离到黑人聚居的学校，而白人的小孩则多在私立学校。并且，无论加纳学生的家庭收入高低，他们仍会被分到收入较低的学校。

第六章《寄养跨国移民子女的困境》提出的观点是，中产阶级加纳人不再赞成向外寄养自己的子女；而接收寄养儿童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加纳国际移民却仍将子女寄养出去，这就带来了矛盾。因此，这一章着重于移民父母在这种复杂背景下与儿童看护者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科伊所指出的，存在一种“阶级关系和义务的逆转”（第156页），这使跨国汇款变得更加重要。

第七章《儿童对看护的期望：爱、金钱和共同生活》侧重于与移民父母分离的儿童的情感领域。虽然家庭单位的实际分裂通常被视为会对子女和父母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但Coe认为，在加纳人的家庭生活和文化“剧目（*repertoires*）”中，即使跨越国界也能保持联系，从而保留情感纽带。因此，子女并不将父母的不在场视为对自己的遗弃，他们对父母关爱的理解也更为复杂。这种跨国“共同育儿”的实践可为跨国移民群体提供更灵活的家庭安排。这种安排既有安全的情感和物质基础，也有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

综上，科伊在该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导致家庭分离的条件，以及人们如何加以应对并形成自己对家庭生活的理解。这本书可为那些从事移民家庭工作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它也向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否有必要重新制定移民政策，使之与移民家庭的生活经历相匹配？

本文采编整理自：

Flowers, T. A. 2016. Review of the book *The Scattered Family: Parenting, African Migrants, and Global Inequality*, by Cati Coe.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2(2), 135-137.

Marchetti-Mercer, M. C. 2016. Review of the book *The Scattered Family: Parenting, African Migrants, and Global Inequality*, by Cati Co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0(1), e1-e2.

Shandy, D. 2014. Review of the book *The Scattered Family: Parenting, African Migrants, and Global Inequality*, by Cati Co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7(3), 965-970.

延伸阅读：

Cole, Jennifer, and Christian Groes, eds. 2016. *Affective Circuits: African Migrations to Europe and the Pursuit of Social Re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情感电路：非洲移民到欧洲及社会再生的追求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J. Miller. 2009.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4th Edition*.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迁移

Falicov, C. 2007. Working with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Expanding Meanings of Family, Community and Culture. *Family Process* 46(2):157-71. 与跨国移民合作：拓展家庭、社区和文化的含义

Page, H. 1989. "Childrearing versus Childbearing: Co-residence of Mother and Child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edited by L. R. J. Lesthaeghe, 401-4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养育子女与生育子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母子同住问题

（编译：贾一鸣，责编：邱昱，排版：胡琼）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99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hehui.pku.edu.cn/second/index.aspx?nodeid=1820>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